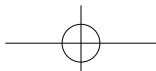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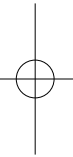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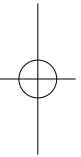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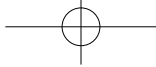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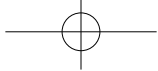
1

政治衰落和国力

Le déclin politique et la puiss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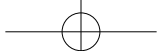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今天，当很多法国人思考国家政治衰落的问题时，我们也同时会对国力进行反思，并且人们趋向于将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

国力是可以被衡量的。它由一国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军力数量及质量所体现。一国国力的高低是通过与他国进行比较的方式进行判定的，这是因为国力的核心角色在于征服或支配他国，或者说保护自身不受他国征服或支配。一般观点可以很容易地将各国实力分为如下几个档次：超级大国、强国、中等国家及其他国家。

长期以来，国力一词特指军事实力。历史上的强大帝国，自亚历山大帝国至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无不是武力征服的产物。近年来出现了经济大国这一概念，它们自身常常建立在一个被摧毁的旧军事大国的基础之上，比如日本。在这种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新式融合过程中，后者依旧是决定性的。如果说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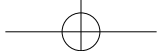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被认为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是因为它拥有在全球各地进行介入的能力，同时也因为在其现行国家战略之下，美国具备同时开展两场军事行动的实力。毫无疑问，这样一份雄厚国力所依恃的，必然是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国家机器。

当我们思忖国家政治进步或衰落的问题时，首先进入我们脑海中的想法就是政治的进步会带动国力的增强，反之就会带来实力的减退。一国政治的衰落就意味着它国力的衰退。

很多同胞相信这种说法。虽然有感于过去时代的辉煌，国人接受当下的现实时难免倍感苦涩，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在与一个强国的称谓渐行渐远，他们于是将这一现状与政治的衰落联系了起来。

不过，尽管这两个概念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但它们依然是有区别的。国力的等级主要基于外部比较，即由外部因素所判定。而一国政治进程中的进步或衰退，却取决于其内在因素。或者说，是由其国民组织和驾驭一份创造性、创新性政治进程的能力所决定的。公元前5世纪取得马拉松战役大捷的希腊，与当时的波斯相比，依然是个弱小的国家，但彼时的希腊却正处在辉煌的政治进步期。

这种由某些客观原因所致的国力减退给法国人带来的郁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体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不应使我们对衰退的本质发生错解，也不应令我们相信它足够解释当前的



政治滑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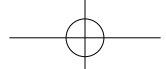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法国的政治衰落是客观存在的。与国力的减退相比，它有其独立的、且有别于他国的现实状况。它由法国自身内部因素所导致，与我们的思维、决定和衍变方式息息相关。对此，我将着力予以阐释。

— 人口革命 —

世界各国国力的变换更替，均是人口数量激增的结果。人口大爆炸开始于工业革命之初，进入 20 世纪以来，它对国力的影响更为显现。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间，地球总人口由过去的 15 亿增加到了 60 亿，足足增加了三倍之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空前的现象。人口的激增导致了大多数既有数据的震荡——食品供应、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城镇人口密度，但它依然远离我们的习惯思维，在我们的惯常思考之中显得不甚重要。尽管人口的激增是 20 世纪历史的主导特质，但我们的教科书在阐述这一段历史变迁时却惜墨如金，以至于不足以阐明其在国家变革和地区冲突解决问题上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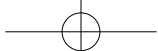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需要承认的是，人口激增带来的后果的确已部分地被工业化



和新式武器的发展所抵消，那些更为先进的国家也因此而从中受益。得益于工业效率的提高和军事工业的进步，西欧国家——首先是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尾随其后——得以逆人口激增之潮流扩充其殖民版图。扩张最终以在全球大范围内实现殖民统治结束，所辐射的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曾几何时，这种殖民扩张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主导模式，英国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人口较少的国家也由此屈从于人口众多的大国。这不禁使我想起了 1973 年我在由吉隆坡飞往巴黎的航班上得到的一个启示，我发现当时那条航线所飞经的几乎所有国家——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塞浦路斯——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纳入过不列颠帝国的殖民版图，而后它们的人口数量便重回顶峰。这一人口上升的浪潮极大地促进了战后发生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和马格里布地区的反殖民斗争。这也渐渐勾画了 21 世纪末世界诸强的格局。

1970—2000 年的三十年间，仅亚洲的人口增长数量就已经与 1970 年世界总人口数持平。这对我们，乃至对于新生代人群而言，都是一个当代特有的现象。1950—2000 年之间，欧洲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从 21.6% 下降到了 12%，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到未来的 2050 年，欧洲人口将仅占世界人口的 7%^①。换言之，

① 来源：联合国统计报告（1998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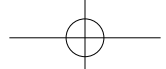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百年之间，我们欧洲人的比重将足足下降两成。

上述人口数量排名的变化给法国国力带来了影响。历史上法国曾长期依仗于其在欧洲确立的人口优势。在 19 世纪初的帝国战争时期，法国拥有 2900 万人口，已然超过了以现有国境面积计算的德国（2500 万），并将大不列颠帝国（1800 万）远远甩在了身后。然而，当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这一状况却已全然发生了逆转。当时的法国人口数量为 4100 万，已被拥有 7860 万人口的德国所超越，即便是英国，当时也已坐拥 4750 万人口，也已领先于法国。

我们也可以在经济领域做同样的观察。工业革命首先使西欧国家和美国从中受益。它们向外部市场大力输出的工业化产品所带来的生产总值，已经在当时全球生产总值中占有重要比重。若以国民人均收入回报水平进行衡量，上述国家的国民人均收入相较于当时的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而言，均得以成倍增长，且增长率在十倍以上，有时甚至是百倍。

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崛起，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终成为世界主导性经济大国。紧接着，亚洲经济于 60 年代后期开始复苏，或者说，开始“觉醒”，因为这一时期亚洲快速发展的国家，正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而老牌工业化国家，至此开始感受到这一全新的竞争态势给其自身工业体系所带来的冲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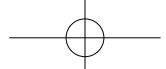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受到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全方位挑战，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上述经济态势的变化影响了法国国民对自身国力的感受。他们起初相信，法国在历史上所经历的一切不幸只是短暂的插曲，事情终究会重新回到其原有的轨道，一如他们从前所习惯的那样。

1918 年结束的“一战”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军事完胜。尽管美国军队 1917 年在洛林参战后，对一战胜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尽管纵观整个“一战”进程，英国的贡献数倍于法国，但不可否认的是，联军一直处于法国的指挥之下，同时战争的形态——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也凸显着浓厚的法国军事文化。法国为“一战”的胜利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基于此，在战争结束后，法国依然得以继续留存在世界诸强之列。不过透过最终的胜利结果，我们却不难发现法国浓重的农民国家的烙印，因为在那艰苦卓绝的四年中，国境之内到处是泥泞不堪的战场和结冰的壕堑，也只有农民出身的法国人才能够找到隐忍生存下来的力量。

1940 年的那场耻辱性的溃败，尽管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极少数人除外——一直讳莫如深，但它却蕴含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即彼时的法国人已然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正在松开双手，从历史进程之梯上慢慢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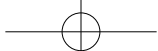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这一由外部事件所引发的国力倒退极大地触动了国人的政治潜意识，他们拒绝接受这一现实。而当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时，



他们又力图将这一切归咎于领导人的失败。“我们被出卖了！”
在 1940 年春天溃退到英国的途中，那些七零八散地散落在路上的
士兵们口中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戴高乐主义的核心要义，或者说戴高乐将军本人当年孤身一
人不懈努力的终极目的，在于重新让法国回归到世界强国之列，
不管它曾遭受怎样的军事失利，也不管它正经历着怎样的入侵和
占领。戴高乐创造了奇迹，因为他面对的是罗斯福总统的敌意，
以及自己手中贫弱的资源。纵观历史，鲜有几人能够仅凭一人之
力逆转历史走向。如果我们说戴高乐将军能够位列这些历史巨人
的行列之中，我想原因正在于他不变的目的是，即带领法国重回强
国之列，重拾法国的独立与尊严。1944 年时的戴高乐是这样的，
1958—1968 年间他的外交政策亦是这样，并且这样的决心正顺应
了当时法国民众殷切的期望。凭借于这样的终极理想，他成功阻
断了，更确切地说中止了法国的政治衰落。让同时期那些不断诋
毁他的政治对手吃惊的是，戴高乐将军在今天依然被民众致以无
上的崇敬，而这一殊荣的取得正基于戴高乐对国家尊严的无限眷
恋，而这也成为指导他行动的准则。

对法国而言，用一个简单参量来反映外部世界的客观变化是
不尽公平的。当我在任总统一职时，我曾认为有必要让法国人适
应新的参考标准。可能，当我们真心意识到我们无法仅凭一己之
力改变世界时，我们会感到更舒服一些。记得 1977 年，在面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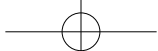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次媒体采访时，我曾刻意指出“到 2000 年时，法国人口将仅占世界总人口的 1%，也就是说，每 100 个世界公民中，将仅有一个是法国人”。做出这番表态时，我脑海中想象的是这样一番场景：一百年后地球上，在绵长的男男女女队列之中，只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属于法国。

这一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关于人口统计，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调研机构——国立人口统计研究院，该机构计算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无可逆转的趋势。然而，我的言论却激起了部分人愤怒的浪潮。“总统故意贬损我们的国家！”国民议会中某个议员团体的主席——克劳德·拉贝先生，曾这样对我批判道。不过，不管人口问题在我的言论中得到了怎样的运用，我显然是触碰到了部分法国人思维中，或者说在某个意识区段内的痛处，而将这个痛处裹覆的，则又是一处伤口。在国人体面的意识之中，世界已然发生变化的这种说法不会得到认同，国人亦不会追求在这变化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它本就属于法国。

在位于巴黎夏乐宫广场的人类博物馆上，镀金雕刻的保罗·瓦勒里^①的诗句熠熠泛光。而整个 1998 年，在诗句下面的三角楣上，都张贴着一片横幅，上面写着“地球已经拥有六十亿人口”。我

① 保罗·瓦勒里（1871 年 10 月 30 日—1945 年 7 月 20 日），法国作家、诗人。——译者注



不知道，当人民透过往来的公交车车窗看到这句话时，会有多少人在暗自思忖：从现在开始，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是法国人。

未来五十年内，世界人口的增长将仅由发展中国家完成，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将进入停滞状态。数字胜于雄辩：1998—2050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总人口数将由 47 亿增加至 82 亿，增加一倍，而发达国家人口数则将由 11.8 亿下降至 11.6 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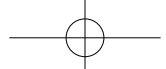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由此，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危机。

— 国力和政治衰落 —

法国在世界强国行列所发生的上述变化，使我们中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国家政治衰落的痛苦后果。我们渴望得到重视与尊重，也同样因现实而感到沮丧失望。

然而这一说法我无法苟同：一国的政治进步与衰落，并不仅仅与其国家排名相关联。它仅表达一个客观事实，而这一事实又是独立于外部因素之外的，比如对人口发展趋势进行的对比，或者对经济发展利好元素的持有度。

一国的政治进步与衰落，是国内社会内部因素制衡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社会活跃度、创造力、文明程度及文化水平、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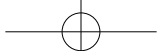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体系的质量，尤其是社会自身的适应力。

让我们回首历史上那些最为辉煌的时期：15 世纪和 16 世纪，荣耀属于意大利，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来自那个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光辉。然而，彼时的意大利在政治进程上却陷入了混乱之中。法国军队曾不时入侵亚平宁半岛——尽管因为统帅的不稳定性，这些军事入侵均为时不长。而罗马教廷所展现的又是一幅极其荒诞放荡的景象，它痴迷于不断的领土兼并和扩张，并乐此不疲！小的共和国和城邦彼此攻伐，相互结盟，却又不断背盟弃约，同时招募外国雇佣兵加入战斗。历史上曾经护佑过 200 万居民的罗马城，那时仅容有 50 万人。然而那时的意大利，在艺术、建筑及文化领域却人才辈出，取得了后世无法企及的杰出成就。尤其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出现了一批国之栋梁和政治理论家，他们的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而对于法国来说，令法国文化价值得以举世公认的时期是 18 世纪后半叶，那时法式品位风靡世界，启蒙时期的哲学作品更为世人推崇。同样地，19 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另一个辉煌期，那时全世界的博物馆里均陈列着法国的绘画和雕塑，这一时期也是小说和其他社会文学作品的繁盛期。

然而在国力的视角下，上述任何一个时期对法国而言都谈不上光辉夺目。首先，在这期间，法国经历了数次军事失利，其国力被一系列严厉的战后条约所削弱，其中包括 1763 年 2 月所签署



的《巴黎和约》。它的签订结束了法国在印度和北美地区的殖民占领。其次，在 1870 年的战败之后，普鲁士开始了对法国领土的占领，而战败的法国却难于恢复元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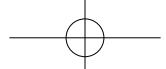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以上展开的冗长叙述，目的在于破除民众心中的一个执念，即一国政治发展水平的优异和该国国力排名的先后必然正相关。时至今日，我们已不能用那些左右法国国力的单一客观标准来解释，或者论证我们的政治衰落。

一国国民的政治生活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可以富于建树，也可以乏善可陈。它可以向外部世界投射出一幅或是积极、或是负面的景象，而无关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正处于何等行列之中。

因此今天，跳出所有经济、人口变动的参考范畴后，我们仍需客观发问：是什么导致了法国的政治衰落？

—— 我们能够定义一个社会的政治衰落吗 ——

事实上，如果国力可以被测算的话，衰落则不然，它仅能被感受到。衰落感能够逐渐侵入到人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中，使民众越发产生一种漠然、怀疑，继而否定的态度，或者用当今的术语来说——姿态。那时，集体的决心与愿景不再为人所感知，也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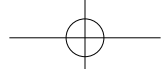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乎不再为人提及。在民众个体性和群体性的满足感面前，更确切地说的不满情绪面前，上述情结已然消失殆尽。

诚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目睹一些旨在让全社会都听到其声音的示威活动，但那些浪潮已不再源自那些基于国家忧患的深层次诉求，或者说已不再是由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所引发的了。它们一般发端于那些利益受限的群体，他们被某一项令其不满的议题所激发，进而通过这些示威活动表达其对所在行业或部门的不满和愤怒。然而，这些抗议群体的代表性很少能够占到全社会的千分之一，更不用说百分之一。因此，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很难为其他社会成员所共知，除非抗议示威对其他社会群体带来了负面影响。

以民众的观点看来，政治衰落不外乎是领导人素质低下，甚至是无能的结果。作为回应，国人首先会设想，假如我们更换了领导人，问题也许就自然会得到解决。随后，当多次换人的尝试宣告失败后，民众继而转向制度本身。正是这个现行制度应该被彻底改变！然而我们的民主制度自身是建立在一个具备自卫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任何旨在消除现有制度缺陷和更正制度弊端的必要决定，无论是否有意为之，都必须取决于这个制度的受益人本身。

①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45年9月—1957年10月），史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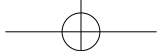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这让我们想起了第四共和国^①令人失望的改革尝试。尽管已经被民众所摒弃，同时又因已完全失控的阿尔及利亚问题而被推向风口浪尖，但国家依旧有力量逐渐压制来自其内部的理性声音，哪怕只是些轻微的建议。而所有那些被压制的建议都旨在让国家更得力地去应对当时的困局。

我仍记得 1958 年 5 月的一天，在骑马雕像路旁原地待命的宪兵给我留下的印象。那天我准备参加国民议会法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作为新议员，委员会给我分配了一间办公室，尽管当时我的身份其实是财政监督员，并且我自身的法律素养还不是那么充分。宪兵们正在议会外原地待命，防止议会受到任何可能的袭击。

“还等什么呢？”一位宪兵对他的同伴说道，他身穿黑色外套，手指指向波旁宫外的柱廊，“还等什么呢？这些人为什么还不出来？”

安全抵达议会后，我找到了法律委员会的大厅，它位于波旁宫的二层。大厅内，借着昏黄色灯泡的亮光，委员会的成员们正激烈讨论着。会议由一位身材纤弱但看上去相当机敏的公证人主持，他是一位来自阿里埃日省的代表。会议的主题是宪法改革，场内的嘈杂声一如大革命时期那些关键时刻一样，只不过所有需讨论的修正案，不论其内容多么克制和温和，都无一例外地在无休止的跑题争论中被先后否决。当我步入会议厅时，议员罗杰·加洛蒂正在大谈特谈他所代表的法国共产党就改革所持的反对意见。



随后，会议又进入了对下一个修正案的讨论。凌晨时分，我离开了这场令人心身俱疲的会议。当我穿过塞纳河右堤上浓密的栗树林，经过先前的那些宪兵时，他们还在那里待命，在巡逻车的影子下继续低声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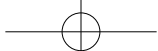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十天之后，柯蒂总统^①召见了戴高乐将军。后者身着一袭灰色双排扣正装，坐在半圆厅^②的第一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部长席”——说出了那句日后被铭记史册的话：“各位女士、先生议员们，我很高兴，亦很荣幸加入你们的行列。”随后，国民议会授权将军主持宪法改革，将第四共和国过渡至第五共和国！

只要观察一下时下那些因担心利益受损而阻挠改革的顽固抗争：对地方选举法合理化改革的阻挠，对于行政兼任限制的阻挠，以及对总统任期改为五年的阻挠——尽管这一改革顺应民意并且明显符合国家现代化的要求。我们可以感知到，如果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制度体系对自己进行改革，会遇到怎样的阻力和困难。

然而，问题不仅限于制度体系本身的不良运转。政治滑坡所表达出的是社会整体的不良状态。它像一名恶性病病患，体内大多数器官均已损坏。

① 勒内·朱尔·古斯塔夫·科蒂（René Jules Gustave Coty, 1882年3月20日—1962年11月22日）他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1954年—1959年）。——译者注

② 国民议会会场。——译者注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秉持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看待法国社会的政治衰落，我们不能把责任随意推脱给领导人或者现行制度。政治滑坡的原因需要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整体论证，但这场辩论的组成元素却是每一个公民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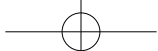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如果需要对政治衰落进行一次定义的话，我把它总结如下：政治衰落，即组织的创造性已不再为其未来的运转而努力改善条件，而是蜕变为对组织特权和所继承的旧体系的消极保护。应对政治衰落的方法，应在于提升社会自身对其内外部变化的适应能力——无论这些变化是否能够使其从中受益。

对衰落的感知

如果说一国的国力可以依据数字进行测算的话，很不幸，国家政治上的衰落却无法进行细致测评，我们至多仅能归纳出一些指标而已。

我可以列举一二。

法国的很多构想曾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的国际社会，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当代制度均得益于法国而得以存在：《世界人权宣言》；欧洲煤钢共同体，随后演变为欧洲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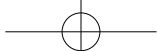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同市场；朗布依埃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后来演变为今天的 G7 峰会；“南北对话”，最终被联合国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欧洲理事会（欧洲政府和首脑会议）；欧洲货币协定——保证了“埃居”的诞生，随后演变为欧元。所有这些构想均源自法国，尽管它们最终经由各成员国集体商议并优化更新后才得以实施。

不过，如果我们聚焦这些法式构想的产生时日，我们会发现，它们正逐渐变得凤毛麟角起来。从 90 年代开始，印象之中便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由法国所提出的政治或外交构想了。

另一项可以引用的指标，是那些一度由我们法国人任职的国际重要职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联合国经济事务副秘书长；此外，在欧洲范围内，有让·莫奈任职的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首任主席；还有由法国人多次担任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主席一职，以及许多重要执行机构的负责人，比如由雷蒙·巴尔担任的欧盟委员会经济与金融事务专员，该职位随后由另一位同胞伊夫·蒂·博德·西尔基接任；以及欧盟委员会农业事务总司司长一职，该职位自 1958 年至 1999 年一直由法国人担任，未有任何间断。

然而时至今日，面对这些同样的职位，法籍人士仅占有两席了。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另一个是任期两年半的欧洲议会主席。而后者的取得，还应归功于尼克尔·方特恩女士本人耐心而不懈的努力。至于前者，却也即将让位于他国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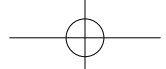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法国目前一个极为令人担忧的迹象，在于似乎不再有自己的长期规划，这一点是有别于当前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法国似乎亦不再努力让各大国际机构接纳自己的候选人，比如欧洲央行的行长一职，过去该职花落法国一直是水到渠成之事，因为法国在欧元创立问题上扮演的是决定性的角色，然而现在却已物是人非。当下的法国，甚至已不敢幻想自己的候选人可以去竞争上述岗位，虽然对于很多职位而言——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我们的文化传统注定了法国人会是最优人选，何况某些职位本就是由法国倡议设立的，比如欧盟外交和防务事务高级代表。

导致这一退步的原因在于当前法国领导人的漠然，至少表面上看就是如此，这也是法国政治衰落的标志之一。

我们是否能够想象，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地已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也许在社会的某些层面，一个行动，一些合作的构想，都会让我们的社会维度更富活力、更具创造性和包容性，然而我们又是否能对这些层面一一了然呢？

这也是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我诚挚地邀请各位读者与我一起探究这些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相伴，任何思考都将一无所获。

不过仍有一种危险须让我们提前敲响警钟：当我们谈论政治衰落时，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而言，他们会自然地形成这样一种想法，即辉煌进步的年景正是当年他在职期间的日子；而当他们隐退之后，一切便开始走



向衰败。另一种想法也是相当危险的，它更多地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特质相关：在人生的后半程，人们所耳濡目染的是“世界的尾声”。他们眼中的世界大都摇摇欲坠，充斥着各种私欲、背信弃义和粗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生暮年之时，创造力的退化已再难推动我们去积极进取。对于我们曾倾注心血所维系的事务，晚年的我们更多的是在拷问，甚至目睹其分崩离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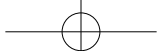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岁月的鬼斧神工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会做如是雕琢，这一点，我们无力改变。不过，我们更应该秉持一种相对的、全面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想法和感悟。

这样的问题古已有之。1371年，意志消沉的彼特拉克^①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观青年一代，肉体与灵魂皆已溃烂，让我不抱有任何一丝希望。我们的这个时代，发育得并不健全，它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不公与罪恶，但我们却给予了它如此的宽容。我们已坠入到了恶行和苦难的谷底。我多么希望自己生于别的世代，抑或三十年前便已死去，抑或生活在印度，或者中国。”

这是诗人在1371年的论断。几十年之后，文艺复兴的伟大进程便开始了。

因此，我们还是谦虚谨慎地做出我们的判断为好。相对于历

^① 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年7月20日—1374年7月19日），意大利学者、诗人、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亦被视为人文主义之父。——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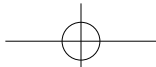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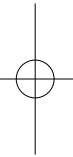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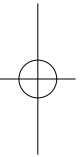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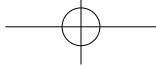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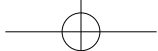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史长河而言，我们眼见的一切不过都是管中窥豹。人类从古至今一直在观察着周遭的世界，并努力延长着它的轨迹，人类的精神认知由此得以形成：比如夏天阳光明媚，我们知道这是大地在回暖升温；如果经济规模得以不断壮大，那么经济增长便会尾随而至。然而要知道，大多数自然现象都是周期性的，人类自身也不例外。因此，我们不能将“政治衰落”简单地称之为公共生活的改变，因为它不过也只是个暂时的存在而已。不过，我们也不能对此漠然处之，我们必须要明了这样的政治演进到底会走向何方，哪怕最后的答案并非一如我们期待的那样。

至于这本小书，我会坚持以最审慎的态度进行著述，不恃个人好恶，更不会因自己的失望情绪而有失偏颇。

我们应当秉持谨小慎微、客观严肃的态度来探究法国政治衰落这一课题，一如对待其他历史课题时那样。

作为文章内容的发端，我会以向同胞发问的方式开始我的阐述，而问题就是：我们与历史，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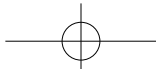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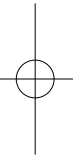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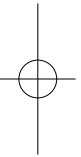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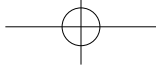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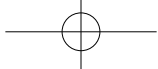
2

与历史的冲突关系

La relation conflictuelle avec le temps







法国大革命是如此非同寻常的一个事件。以此为发端，开启了一系列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事务的考量。任何一件事，如果它不是大革命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对法国而言都显得无关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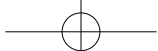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欧内斯特·勒南，引自弗朗索瓦·福雷^①

为了结束马列主义在俄国的存在，应该进行另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由此对过去继续“清台”。

——弗朗索瓦·密特朗^②

① 欧内斯特·勒南：《法国君主立宪制》，载《两个世界》月刊，1869-11-01。

② 弗朗索瓦·密特朗：《从德国开始，从法国开始》，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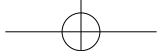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埃德蒙·伯克关于法国大革命必然失败这一论断的核心观点在于：法国人试图将自己的过去完全“清台”^①。伯克写道，对于他们而言，改革应首先开始于对旧制度的彻底铲除——只有旧制度被消灭后，方能着手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与英国人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伯克继续写道，对于英国人而言，改革的目的在于改良现有的事物，并保留旧制度中那些令人满意的部分。他们不赞成一刀切式的做法，相反，他们认同事物的延续性。1688年发生的“光荣革命”——在他们的历史书中几乎已难寻踪迹——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对现行的君主制及其权位世袭原则进行拷问；事实上，这些制度反而还因此得到了正式的确认。革命的真正意图在于质疑王权的局限性，并力求将权力移交给议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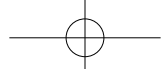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而法式革命的意图在于对旧状况的“清台”，并代之以全新的制度。这些新制度勾画的依据是理性评估，与过去毫无瓜葛。然而，这似乎是有悖于自然演进的法则的。切断了历史根基和丧失了社会组织造血功能的革命，所能创建的只能是一个不稳定的架构。在一番新的“清台”运动的影响下，其注定会提前垮塌并迅速消亡。

^① 法语原文为 *table rase*，原意为清光桌面，书中指完全颠覆过去的一切。——译者注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这种革命精神取向今天在法国依然健在。法国也许是当今唯一的一个可以打着“革新社会”的旗号赢得选举的大国了，正如 1981 年的总统选举那样。然而人人都清楚，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近五分之四的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都是基于客观因素而得以确立的。对于政治家而言，实际的挑战在于如何引导剩下的五分之一良性发展，并取得优异的经济成效，提升社会公正。

1981 年大选中“清台”这一口号的回归，也许只是政治人物为多赚选票而祭出的手段而已，也许他们自己都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这一举动却在民众之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甚至被一些政治分析家所接受，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国家生活层面的剧烈震荡。1981 年之后的几年，政府开始了极端的国有化进程，直至 1990 年后，刚刚经历国有化改革的领域又兴起了新一轮私有化的反复，而后者所触及的范围，甚至涵盖了 1980 年之前便已存在的公共服务领域，比如通信行业、法国航空，以及航天部门。同样地，对于劳动者退休年龄这一问题的处置，他们的手法亦如出一辙。国家首先规定了 60 岁这一法定年龄（着实是人口学的灾难！），然而 18 年后，面对当年这一决定的所带来的恶果，他们又再次费尽心力地重新回到了从前的政策轨道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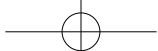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先废除，后改革——

我常常自问，为什么法国人的思维中会有“清台”这一怪癖。它是法国原创，同时映射着法国人的性情。它是如此的怪异，更与很多主流政治思潮格格不入。比如说儒家思想，历史上它曾订立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模式和样板，更有待今天的我们于其中一探究竟。而在当代社会的框架内也不乏这样的潮流，比如当下我们的许多欧洲伙伴正走在一条“进化式”改革的路上。我们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德国、英国、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领导人会去策划一场浩大的“清台”运动。当然，80年代英国的左翼工党确实进行过一些轻微的尝试，然而他们最终被无情地赶下了政治舞台。

1917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①以及中国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曾实践过这一颠覆式改革的原则。前者旨在彻底废除俄国社会业已存在的既有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消除传统文化思维对国人的影响。二者发生时的革命土壤相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而言，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最后的革命结果以伯克的理论来看，只是制造了剧烈的社会痉挛，却未能如预期的那样，构建全新的普遍秩序。

^① 极具象征意味的是，《国际歌》的词作者，法国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在歌词第一段中首次引入了这句著名的话“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原著。“落花流水”原文亦为 table rase。——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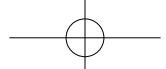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不过法国革命进程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颠覆式的革命曾不止一次发生过：1792—1795 年^①之间发生过，1848 年^②发生过，而在 1871 年^③那个悲情的巴黎的冬天，又继续发生过。

尽管这一颠覆式革命理念的内容本身也在发生着演变，然而当 1936 年国民阵线掌权后宣告“新世界”已经到来时，我们依然能觅到它的踪迹。这里顺带说一件我的亲身经历：1984 年 7 月 6 日，当我的继任者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到访克莱蒙－费朗时，他非常希望与我进行一次会晤。会谈期间，他向我阐释了他的构想，而也是在这些构想之中，我再一次嗅到了这种革命的味道。

密特朗起初计划前往我在尚奥纳的寓所与我会面，那时我觉得，如果把会谈的地点设在当年我任沙马利埃市长时的那间办公室里会更妥帖些。现任市长遂满足了我的心意，将房间腾了出来。见面的那天，房间里正堆满了我的那本《三分之二法国人》，那时它正等待最后的题献，而房间外，则挤满了媒体记者。我们将房门紧闭，面对面地对坐在两只红色天鹅绒沙发上，每只沙发旁边都配着一张小圆桌。办公室的现任主人——克劳德·沃尔夫先生已

-
- ① 1792 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专制，法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后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译者注
- ②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奥尔良王朝，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译者注
- ③ 1871 年巴黎革命。法国在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签署《凡尔赛条约》，割地赔款。随后巴黎发生政变，推翻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起义民众曾建立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后经镇压宣告失败。——译者注



经在小桌子上面备好了两杯咖啡，又布上了一只插着银莲花束的花瓶。密特朗首先开启了话端，在一番轻松的寒暄过后，他略沉寂了片刻，仿佛正在脑海中探寻一个真相一般。突然，他开口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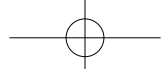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我的想法是，消灭法国的资本主义！”

面对这一句突如其来的话，我一时间惊得屏住了呼吸，而密特朗继续肯定地说道：

“是的，必须要消灭它。总结我们的历史后，我便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是资本主义的存在阻挠着改革的可能。只要它不消失，那我们就永远无法前进！”

这种根深蒂固的“先废除、后改革”的思维，或者甚至是“为改革而消灭”的思想，也许就是法国人性格的写照，关于这一点，我后面会继续探讨。不过，我们身体里那些遗传自高卢—罗马和法兰克人的血脉，却并没有植下这些革命的基因。而历史上那些政治著述中——比如说 18 世纪前那些著名的“正统主义者”的文章之中——亦没有提及。于是我会问自己，它果真不是法国近代历史的产物么？它难道真的不该归因于我们与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与我们的过去——那糟糕的关系吗？

法国是一个对各类纪念仪式热衷到近乎疯狂的国家，然而对于 1789 年大革命之前所发生的事，除了那些宗教节日外，我们却从未纪念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举个例子，在密特朗主政的 14 年时间内，法国没有举行过任何一次有关大革命之前



历史事件的纪念仪式。对此我确信不疑。

就这样，尽管我们的政治制度在欧洲历史上可谓最为久远，然而在大革命之后，法国几乎度过了近两百年“遗忘”的日子。在国际舆论层面，我们也一直树立着这样的“遗忘”形象。于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其 1989 年 7 月刊的封面上写道：法兰西两百岁了！永别了，路易十四，亨利四世，弗朗索瓦一世，永别了，黎塞留^①，圣女贞德，杜·盖克兰^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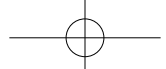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可以满足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今日的生活，以及所有对它而言至关重要的存在，都形成于这“沉默”的两百年。

然而阅历却告诉我，我们的很多习惯、制度、实践，甚至是法律条文，却仍与旧时代如出一辙。同样的现象换做是在英国、巴伐利亚，或是卡塔卢尼亚的话，并不让人觉得奇怪；然而问题是，它却也发生在我们的法国，这是何其让人惊异的事。

当年我任财政部长时，曾试图改革现行的那份有失人道的没收充公制度。在那个制度下，如果一个商人或者艺术家遭遇破产，国家将没收其住所内和属于其家庭成员的全部个人财物，并将其

① 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1585 年 9 月 9 日—1642 年 12 月 4 日），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及天主教的枢机。——译者注

② 贝特朗·杜·盖克兰，被称为布列塔尼之鹰。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军事领袖，从 1370 年到他去世一直任法国骑士统帅。——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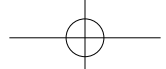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公开拍卖，仅有床可以幸免。我发现，这样的没收制度其实正是旧时代的产物，并且是毫无保留的继承，甚至连称谓都丝毫不变。

同样地，今天的民众面对政府高官时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让我深感不解。我不忌惮这样说，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们的表现实在有些夸张。没有哪一次的地方活动能够在少了“省长先生”出席的情况下进行。人们从大老远开始就注视着他的车子一路尘土飞扬而来。当他缓缓下车时，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每个人都站定自己的位置，却又都倾出半步，以便能有幸和大人物握手。人们脸上尽现着各式各样阿谀的笑容，而这样的谄笑却也只有在这种官方场合才能一览无余：一道细长的笑纹无限拉向两个嘴角，直到再也拉不动为止。

这副样子，让我很难将它与天生无厘头并情愿不恭不敬的法国人联系到一起。直到在历史学者米歇尔·安东尼关于18世纪王权的书中，我才找到了可能的解释。那时的法国各省均由总督管辖，他们能力超群，手握重权——尤其是史上著名的奥弗涅总督。由于法王很少巡游各省，除了赴东部和北部战场视察之外，他至多不过在各处行宫间游走，因此民众几乎不可能见到自己的国王。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百姓见到王权在地方的最高代表——总督时，他们心里就会迸发出一种仿佛亲自面圣一样的敬仰之情，半是羞涩，半是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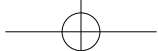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于是我常常很想知道，那些在地方活动中既兴高采烈又毕恭



毕敬的民众，是否真心清楚其历史渊源呢？

长期以来，人们对行政法院的决议和意见所给予的重视，也让我倍感惊诧。如果说，行政法院每每只会在最后时刻才能对个人和国家间那些争执性的论战做以了结的话，这对我而言倒也正常。然而对于另外一种现象，我却很不以为然：一如第四共和国末期的旧例，政府总是通过发布政令的方式规定，所有法案都必须在征询行政法院的意见后方能通过。后者无论在哪一个案例中，所提出的均无非是些简单的，或循规蹈矩的意见。我曾研读过1958年宪法的内容，但我并没有找到这一怪象的相关出处，对于其他国家机构则不然，比如议会两院、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宪法委员会，它们均在宪法之中有着明文规定。其实关于行政法院身份的唯一宪法说法，仅涉及两项条文，它们规定相关命令和法案在“征询行政法院意见后”再由部长会议另行颁布，除此之外，再无他说。此外，行政法院的机构人员并非经由选举产生，而是通过竞争聘任上岗。他们的职衔被称作是“助理办案员”“审查官”，对此公众早已不在乎它们指的到底什么。不过当这些人迈入体系的高层时，他们在制度上会被统称为“国务顾问”。

如果我们翻阅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文献就会发现，今天行政法院的运行机制和相关职衔，完全复制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旧例。它是旧时代顾问制度的活化石，在那个时代中，它颠覆了君主专制，并在一个新的司法及行政网络内对王权进行制约，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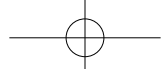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如“审查官”一词所包含的意味一样。

行政法院历经法国大革命而得以留存。在后来拿破仑所颁布的《共和八年宪法》中，行政法院的身份和职能通过四项条文得以体现。行政法院肩负“代行立法院之职，并代表政府捍卫法律”的职能。在拿破仑治下，立法院渐渐沦为边缘化角色，行政法院最终成为帝国时期唯一具有审议职能的国家机构。拿破仑本人亲任行政法院总裁判官，皇帝仔细遴选机构成员，并亲自前往参加各项会议。通常，他每次到会都要以隆隆鼓声为开场。

拿破仑时期的行政法院被集中于皇家宫殿中办公，时而在杜乐丽宫，时而在圣克卢。在厅内隆起的基座上，皇帝宽大的座椅端正居中。会议时常因皇帝的侃侃而谈变得冗长不已，有时会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这中间仅有一刻钟的休会。皇帝本人却不感到疲惫，他仍像刚到会时那样精力充沛。皇帝安逸地坐在宝座之上，时不时将左腿搭在右腿上轻松片刻。

迟到对于那时的与会者而言，是一件相当不幸的事。一旦会议开始，厅门便被紧锁。任何人——无论皇亲贵胄——在没有皇帝的特别许可下均不得进入会厅。有意思的是，当年雷厉风行的戴高乐将军主持部长会议时，也照搬了这个手段。我仍记得有一次，农业部长埃德加·皮萨尼因“感冒”迟到了。将军面露嗔怪之色，但并没有答话，只是示意他马上就座。

我告诉你们，与会时的拿破仑皇帝却很让人大跌眼镜。据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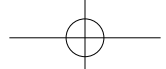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时参会的一个见证者^①回忆,只要皇帝到会,议程总会进展缓慢:“因为很多时候,会议正在进行,皇帝本人却仿佛如梦未醒。还有的时候,他会东拉西扯一些政治话题,这些话题却都无一例外地跑题。不过这些闲聊也是很有料的,比如他会谈到自己灵魂状态的某些征兆,时而也会透露一些他的政策和计划。”

同样在这一点上,戴高乐将军也有的一比。在他每周与部长们的周例会期间——当然也包括当时还是财政部长的我——将军首先会着手讨论大家刚刚向其汇报的事项。紧接着,大概半小时后,他开始转向别的话题,感觉仿佛是在向与会者展现自己的分析推理能力一般,看看大家的反响如何。与会的各位部长们,则不自觉地扮演了民意代表的角色。

话题回到行政法院上来。在 19 世纪的法国,中央行政法院已然成为集权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然而事有波折,1870 年 9 月 15 日,当时的第三共和国政府宣布废除行政法院,但在 1875 年 2 月,由保皇党人控制的国民议会又将其恢复,并赋予总统对行政法院的人事任命权。

此外在司法层面,法国今日的法律蓝本及司法实践均是在大革命之前的时期成形的。拿破仑时代,他授权法学家波塔利斯等

^① 《由一位行政法院成员所汇集的拿破仑关于各类政治和行政议题的观点》,巴隆·佩莱(德拉洛泽尔),1833 年由费尔曼-迪多出版社刊印。



四人组成委员会，编辑起草著名的《民法典》。基于此，很多人对于拿破仑为现代法治做出的贡献深信不疑，并认为当代司法的起源都应追溯至 19 世纪头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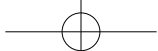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事实上，拿破仑的法律建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阿居瑟首相的启发。后者 1727—1750 年主政期间的相关改革论述，力图将国家司法体系由中世纪法庭众多、卖官鬻爵的旧形态，变革为更加理性且更加经济的新形式。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意在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解，即拿破仑的众多举措只不过是阿居瑟的翻版。

不过确实要看到，当年阿居瑟^①时代确立的司法程序，后来一直为国家司法最高权力机关——高等法院所沿用，这种状况直到 1947 年才得以改变。

至于法律术语方面，一些常用词汇，如“国家”“共和国”“民主”，也皆是过去的产物，它们仍被今人不自觉地应用于现代司法实践。

“国家”一词，无论你相信与否，正是一个古为今用的典范。正是旧时代的人物黎塞留，首先提出了“国家利益”的说法，而年轻的路易十四那句著名的“朕即国家”更为人所共知。因此今天，当很多应聘公职的年轻人宣称“为国家部门所吸引”时，他们其

^① 1750 年，80 岁的阿居瑟与世长辞。在他生前遗嘱中，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与穷人一起安葬。这一遗愿引发了一系列丑闻，最后路易十五要求其家人将骨灰安葬于奥德耶公墓，并为他的墓地敕建了一座斑岩尖碑。



实都援引了旧时代的说法，只不过这一表述由后来的帝国时期传承了下来。

同样地，“共和者”一词也有其古代渊源，只不过今天的它有着不同于旧时代的特定意义：它特指那些对共和国的反对者持不同意见的人。

由此看来，我们的词汇体系以及由它所描绘的法国人的精神状态依旧是嗜古的，且与那些逝去的历史中断紧密相连。

不过同革命时代相比所不同的是，它们并没能为未来带来任何一丝新鲜的气息，也没能实现向未来的跨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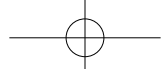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这也部分解释了 1968 年学生运动能够成功的原因：他们创造出了崭新的表达，比如“对权力的设想”。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我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我也选用了一些新颖的用词，比如“超前自由主义”“缓和争端”等。

前面列举的这些例子只为了揭示这样一个不争事实：当前的法国，并没有如当年农民式革命所期望的那样被“清台”。那种将旧秩序全部根除并代之以唯理化新制度的设想，在法国没有能够实现，至少说，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也就是 19 世纪时，那些急于重建社会的民众，最后转而变得持续悲观的原因。

而法国人与历史——或者简单地说——与自己的过去之间所引发的种种冲突和纠纷，也正归因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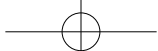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这同时也解释了 19 世纪法国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共经历了



两个帝国、两次王朝复辟和两次共和国)。这种动荡的余波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在其影响下，我们再次目睹了两个共和国之间的更迭。这些动荡的发生皆是政治对抗的衍生品。暴力革命阵营的另一头是理性主义阵营，他们源自启蒙时代，认为既有社会政治秩序是时间的产物，并当由今人不断改良丰富，以适应时代进步的潮流，颠覆式革命行为显然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而革命派面对其政治理念迟迟无法实现的现实，自然愤怒不已。于是时不时地——如果我可以这样形容——他们会把政治对手也索性铺在台面上，并试图一并“清”掉。

不管怎么说，我想这种无休止的冲突，也间接让我们的国人变得宽容了好多，尤其当代表各自阵营的总统和总理继续在国家政治舞台上针锋相对时，民众却对此淡然处之。这种国家两大首脑间相克共生的局面，过去的 14 年间共发生过三次，不管民众持何观点，这一现象本身就是有违宪法宗旨的，何况国人一直宣称忠于宪法精神，更从未停止过对于提高政效的诉求。也许，国人正是在这种共存之中，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让社会两大阵营团结一心的结合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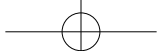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颠覆式革命派和渐进式改良派的激烈冲突，时至今日已演变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势不两立。两大政治流派间横跨着巨大的历史鸿沟，即便今天来自对立阵营间的代表可以联合执政，让这一沟壑看似业已填平，在我们的政治潜意识中，两派依然是天然对立的。



这种情况区别于我们的欧洲伙伴和美洲盟友。在这些国家中同样存在着“左”“右”之争，对立双方有着彼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对经济社会问题各持己见，甚至分别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传统立场。这样的对立，并不涉及对国家政治体制本身的动摇。比如就英国而言，对政体的讨论难得能激发公众的广泛兴趣，倒是戴安娜王妃的溘然长逝，反而在社会舆论中引发了强烈的议论风潮；又比如在德国，尽管新宪法确立的时间并不长，宪法内容本身彰显着执政多数派的烙印，但人们却从未选择就政体问题展开讨论。

事情到了法国，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不共戴天，无论假以怎样的包装和掩饰，背后映射出的都是农民式革命阵营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冲突，这俨然已成为了一种文化传承。这样的感受让每一次的论战都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仿佛参与者分别隶属于两个不能共存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左”和“右”已不能够被理解为同一种政治观念的两个变种；相反，它们蕴含着强烈的拒绝和排斥的意味。

两个世纪前爆发的大革命对于法国而言，是国家由封建时代向民主时代的激烈过渡。之后的 1870 年，法国又为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尽管这次尝试只停留在了臆想阶段，它距今也已有 130 年之遥。不过今天的状况与上述这两个时期相比，却更加令人倍感奇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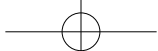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今天的一些政治术语同样留存了决裂的印记。当雅克·希拉克总统发表讲话，表态要践行“共和国法律”或者呼唤“共和原则”时，他的真实意思其实是“践行民主法案”，参照的也是“民主的原则”。他可能有意无意地想先以左派的方式进行保证，同时将有关体制形态的争论直接搬到台面上来。这样的论争在今天看来，已变得空洞且毫无目的。

语言学，或者说对于词汇应用的研究，是一件饶有兴致的事。一些词听来很响亮，然而当你静心聆听那响亮过后绵长的回音时，你便会收获不一样的内容，仿佛是来自远方的消息。你会发现，你所惯常理解的“共和主义者”，其实不是指那些认同国家现行共和国政体的人，它更多地是指那些与共和政体的反对者进行论战的人士。

同样地，当以行动极其克制著称并因此而广受赞誉的利昂内尔·若斯潘先生在国会对右派议员讲话时，也许是疲劳所致，正直的总理先生再次将自己置身于那条天然的政治鸿沟中。他言辞激烈地痛斥右派议员，仿佛后者是坚定的“反德雷福斯派^①”，也仿佛后者仍在支持奴隶制一样。这一瞬的历史拉近却真真让人室

① 德雷福斯事件，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于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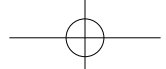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息！他似乎有意请莱昂·甘必大出来见证这一切，说来也巧，甘必大当年与其情妇雷奥妮·莱昂发生争执后中枪，不久身亡，而逝世的 12 年后就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不过总理先生显然刻意回避了一个事实：在七月王朝时期，正是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派议员创立了旨在废除安的列斯群岛奴隶制的特别委员会，而这一目标不久后就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得以实现。

一边听着总理先生的抨击，我一边想象着此刻若斯潘脑海中的右派议员们的样子。在半带着疲劳半夹着兴奋的总理先生看来，在座的右派议员肯定像多米埃笔下的漫画人物一样，正绵软无力、无精打采地靠在长椅上。如果时下的场合允许的话，他们就会暗自将就着认可安的列斯省残留的奴隶制，并且会为军中所有犹太裔军官安上间谍罪！

这些公开的争端正印证了埃德蒙·伯克的担心。时至今日，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依然上演着两军间的混战，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

但我们或许可以笑着质问一下这些论战的实践意义。这些政治辩论在国家由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进程伊始时确实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今天，所有人都明白，法国已然发展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后工业化社会，它具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和财富再分配机制，任何试图对社会进行整体“清台”的想法都已失去了其实际意义。那些曾力图进行颠覆性尝试的人，比如像 1981 年



那样，最后都不得不掉头回到原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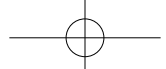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不断强调这些论战的持续性，是因为它已阻碍了法国社会的进步，其负面效应加剧了国家的政治衰落。

至于负面效应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层面：

首先，这些政治斗争将法国与其自身所蕴藏的巨大历史财富相剥离。法国人只有和自身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历史紧密相依时才会感到幸福舒适，才会更自信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法国史应该是全体法国人共同的历史，期间接续着由不同历史阶段所表征的不同时代现实。而这些历史片段所凝结而成的，是一份唯一的历史遗产，它包含了法国从古至今丰富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遗迹。

然而消极论战的持久性却凿开了一条鸿沟——是鸿沟，不是褶皱——它的存在及其深度让国家为此深受其害。这条沟壑划出了对立的两派，让人们不但失去了携手共事的可能，更彼此心生敌意，甚至时常互相攻讦。试问我们当中有哪个人曾免遭诘难——只因立场不同而被断然拒绝——哪怕一生之中仅此一回？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立背后所隐藏的空谈实质，着实更让人气恼。政治上的对立已经完全脱离了民意的客观实际。从接受教育开始，国人绝大部分的政治社会经历及工作阅历都是一致的。那种试图在人群之中强行找到“左”和“右”的界线，或者针对退休年龄问题进行心理学式管理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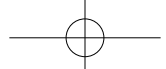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在伯克的书 中，作者并没有号召人们去关注政治演进过程中的客观社会现实，我想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天赋人权”思想的捍卫者们已经与暴力革命的追随者们分道扬镳了！

鉴于政治斗争的分化效应加剧了国家的政治衰落，现在也许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国民教育体系首先义不容辞，它应致力于在青年一代的头脑中建立起一份平静的历史记忆。同时，政治—媒体阶层也应有所贡献，不过这一期望显然更为艰巨，对他们而言，那些不断重复的政治话题业已确立了他们的表达程式，令其欲罢不能。此外，固守这些既有的话题也省去了他们探讨未来的时间。更何况未来相较于现在，说起来也不见得会让人轻松。

法国政治论战的激烈景象也许就是法国人自身性格的延伸：他们对于政治对立会表现出一种“近宗教式”的脾性。其中非宗教成分在于国人的信仰之中神学色彩淡薄，宗教性则在于他们期待有一种政治，人们在其中能找到宗教依托，这是一种全局的世界观，并且还要明确定义他们在其中的定位。

这种政治和宗教间的相似性，让国人的态度也趋于类同，进而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宗教的倾向：教条主义、狂热主义、零容忍、摒弃或者排斥异己。我想在其他国家的话，任何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的激烈恐怕都不会达到法国这样的程度，当然，为了攫取权力而进行的直接对抗除外。

然而，这样的观念从何而来？我仍记得那年在北京时，我曾



与我们的驻华大使就这个话题进行过一次对话。那天我正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室，等待登机返回巴黎，大使先生特意前来为我送行。

“这种对全局世界观的追求，”他肯定地说道，“从苏杰尔^①开始到圣伯纳德^②，一直印刻在我们法国人的观念之中。通过那些来自法兰西高卢—罗马的年轻传教士的传播和当时规模较大的著名修道院的推动，这一观念遂成为法兰克王国立国的基础。在随后八个多世纪的君主制国家里，这一观念一直得以传承，从无间断，最终成为法国人的本能观念，它包括对好与坏的感知，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善行与恶性的判断，还有对天国世界的探求，以及对天父所崇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接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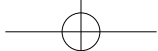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大革命的爆发又让这一理念的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了推翻旧制度，就必须对‘人’自身进行重新定义，并力图赋予他普遍意义。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努力。”

“外部世界应该对我们心怀感激，因为它会发现法国一直在向其传递普世的自由观。正像戴高乐将军所宣称的那样，法国引领了全世界的自由！”

“此外，这种教条式的取向即使在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

① 12 世纪“圣德尼”修道院院长。——译者注

② 12 世纪“克莱沃”修道院院长。——译者注



很多想法。比如说，过去十几年间，正是法国在试图为其干涉权寻找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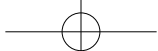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听着大使先生的见解，我觉得他指出了我一个我一直以来都忽略了敏感之处。法国人确实对于“人”这一观念争论不休，以至于不惜将其引入政治层面予以讨论，尽管不甚明显罢了。有时来看，这确也是部分政治论战的意义所在，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其苦涩的另一面，即相互反对的态势变得愈加根深蒂固。没有人会在“人”这个核心议题上轻易让步。如果我们对于“人”的信仰彼此对立，那么当我们走在市镇乡间的小路上时，哪怕是我们多年的老邻居也不会跟我们打招呼。如果我们的观念彼此不同，我们既不会向魔鬼脱帽致敬，也不会向戴着教士帽的人屈身献礼。

基于对人自身定位的不同理解，法国社会自然被分割成了两派，且二者之间天然对立：

——对于具有天主教文化传统的法国人而言，无论他们是否完全皈依，都会认为天国与人间是紧密一致的。任何破坏这一和谐关系的举动都将被视为有悖伦常。

——对于新教徒以及随后的启蒙思想家和实证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人们对政治及宗教权威性来源的审视必然要和“人”自身境遇的转变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还要做到言行一致。

基于此，受上述两种观念所影响的国民教育体系所折射出的，



是其深深的绝对自由主义烙印：在“强大”面前，应保护“弱小”；在“权力”面前，应捍卫“自由”。

因此，法国社会的政治论战因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或者说两种“宗教”的对立而激烈不已，而对立的核心则是出于对“人”的理解的不同。

然而这种观念的对立今天还存在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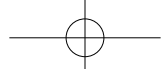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大使先生的说法非常有见地，他解释了很多我们自身行为的来由。但是它们仍旧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么？

中方礼宾官穿着一身电光蓝礼服，沿着一排红色长毛绒质地的沙发向我们走来，通知我们飞机的起飞时间。

可刚刚我们所讨论的观点依然在我的脑海中回旋。

我试图将它们抓住并明晰下来，通知登机的广播带来了一阵嘈杂声，让我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思考。我依旧想不明白：哪怕就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自身的教育经历和学习经历都已经深深固化，可为什么在我大半生的时间内，却从未感受到一如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的观念冲突呢？在我看来，这种深深的决裂是源自于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渡中所秉持的不同信仰和不同习惯。对法国而言，这是一个平缓的过渡进程，它发端于宗教战争，结束于共产主义思潮的衰败，大革命仅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节点而已。

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个方程影响了我的判断？在政治论战这个问题上，我本人不会去参与这些狂热的、专制的和缺乏内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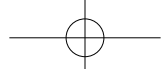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泛泛而谈，我所接受的科学观教育让我总能迅速认识到自身学识的不足。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观念导向应该变得更加缓和化、更加儒学化（机场已经催促我登机了么？），并与当代人的智慧和世界自身的缓冲平衡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再拘泥于那些关于“人”的教条定义，甚至是攻讦之中。

大使先生也许觉察到了我脑海中的这些思维碰撞，于是继续对我说道：

“不知您是否读到过三十年前，由斯坦利·霍夫曼组织研究并在哈佛大学发表的那篇论文——《法国研究》^①？这篇论文由众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的多篇文章汇集而成。其中有一篇文章，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杰夫·R. 佩茨所写，他在文章结尾总结道：

“法国社会的基本模式就是混乱。法国人只有在共同反对权力的斗争中才可以彼此凝聚并相互融合到一起。这种混乱对他们而言，亦是一种抗争。在其不羁的表象下，暗藏的是法国人与时俱进的‘宗教’情结，这种情结引领他们去追求实现新的集体价值和社会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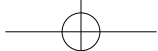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① 《法国研究》，赛伊出版社，1963年出版。其中由劳伦斯·怀利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分析了法国社会对于变革的阻力。作者前往法国的两个村庄居住：一个是位于大西洋卢瓦尔省的尚佐，天主教文化传统；另一个是位于沃克吕兹省的鲁西隆，那里的居民是世俗的，并且有“共和”传统。“凭借对这两个村庄的了解，”作者写道，“我清楚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因此他们的分裂是很讽刺的，这源自于他们不同的信条，以及他们在巴黎的代理人的不同态度。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地将这两个村庄的居民对立开来，只是他们所继承的信条，让他们至今仍保持对立。”这是本书的论题。



听着这番话，我的思维又回到了 1968 年的那个 5 月，回到了在爱丽舍宫里孤立无援、怅然若失的戴高乐将军身上。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已没有时间再去和大使先生做更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会一直坚持我最后的观点：每一个法国人内心信仰的深处都是理性的，这源自于我们对于希腊文化的传承。基于此，热情和理性可以永恒交织，并存于各种政治辩论的激烈交锋中。加斯頓·贝格先生曾希望赋予法国一句新的国家标语——“文化、素质、自由！”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词——“提升”，借以表达我对社会应该更具活力的期望。

飞机终于起飞了，它飞到了一片清爽却又潺潺流动的草原上空。阳光从地平线喷薄而出，清晰地勾勒出北方远山的千丘万壑，那层峦叠嶂的景象，一直向着蒙古的方向延展而去。

飞机带着我疾驰而去，伴着空气摩擦机身所带来的些许颤动，它带着我一起飞向了回家的路。而路的终点，依旧是那个“混乱不堪”的法国，不过我相信，这个国家的精神内核依旧是理性的，它在尽其所能地确保社会的多样性，并力图在其之上建立一种稳固的和谐。法国，从未停止过对于这份和谐的孜孜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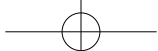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让两个法国彼此拉近

在我任职总统期间，我已意识到这种政治鸿沟的长期存在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要承认，我对于其历史渊源的认识是不足的，甚至可以说是太少了。对于这种纷争的性质，我那时至多不过有一种粗线条的理解。

这并不妨碍我试图解决问题的意愿，我希望尽早结束这种国人彼此攻讦的局面。大方向上，我引用了“缓和争端”这一词，希望国人能够在行动上做出改变。

当年作为政府财政部长，我曾有机会多次赴国外参加各类国际论坛，也曾有幸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国内外现状的对比曾让我深受打击：在法国，左右派政治人物之间几乎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深广的政治互信，这种形式在其他西方国家却是极为常见的。为了尽量缓和这种状况，我有意邀请 18 年前便已远离、或者说被逐出爱丽舍宫的左派政治领袖重回总统府议事。他们应邀而来，一开始却显得异常谨慎，甚至有些踌躇不决。在 1978 年 4 月的第一次会面中，我向他们咨询了从刚刚结束的议会选举中可以得到的经验教训。紧接着在这年 5 月，我又向他们请教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即将开始的联合国裁军会议上，法国该持何种立场。说到裁军大会，这里应该顺带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在此之前，法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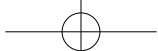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直缺席该大会，但我决定参加那年的会议。我认为法国之前的长期缺席不利于国际裁军问题的解决，更与法国在历史上长期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相违背。

乔治·马歇^①拒绝了我的邀约。在他看来，这种会谈不过是“无意义的聊天”而已，但密特朗接受了我的邀请。要知道在我的两位前任同僚任期内，密特朗从未踏足爱丽舍宫一步。我在一层的侍卫厅接待了他，厅内白金色相间的木饰，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到访前，他要求带上他的国际事务特别助理——利昂纳尔·若斯潘先生一并前往，因为他对这一番面对面会谈的目的仍存有戒心。若斯潘先生一副青春仪容，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位心怀不同政见的专注的学生。他戴着一副金属边框眼镜，睁大的瞳孔中投射出惊异的眼神，看上去是对当下这个陌生的场合多少有些不安。他头发如荆棘一样蓬松，张立着稻草色的鬈发。真的，就这点来看，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

至于我这边，我邀请了我的外交事务顾问加布里埃尔·罗宾先生陪同参会。他思维清晰缜密，在他的协助下，我准备好了相关文件，并将带他一同前往参加裁军大会。至于眼下的会谈，应该说我们彼此的发言都很谨慎，密特朗显然不想对一个自己并不熟悉又同时无法预见后果的议题做出任何承诺。不过怎么说，这

① 乔治·马歇，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次会谈算是开了个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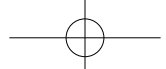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密特朗在他去世的前三周再次约见了。那时他向我透露，他一生当中仅以个人身份见过戴高乐将军一次，至于乔治·蓬皮杜，却连一次也没有。要知道，他们可都曾是第五共和国的总统。通过这个事例不难看出，政治阵营之间的关系体系是何其的破败和紧张。

然而局面却在加速变化。1980年5月，教宗让·保罗二世首次到访巴黎，我邀请各大阵营的政治领袖前来爱丽舍宫迎接。他们这次悉数到齐，并且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站在前排。之前拒绝过我的乔治·马歇，这次在夫人的陪同下也如约而至。而密特朗和希拉克更是并肩站在一起。可以说这一回，正是几个月后即将开始的总统大选，成了天主教选民的救星。

教宗向前来的众多来宾发表了个人讲话。节日大厅内人满为患，高温几乎将人窒息，那天其实本应开窗通风的。人群的嘈杂声充斥着爱丽舍宫，并从星形广场一直延续到协和广场。

当然，你们也许会说，这些看上去的进步不过是表面现象。你们说的没错，不过它们至少为政治对抗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并开始将政治行为引向缓和。正是这些缓和，才使得后来的总统更替得以平稳过渡，而不是像政治人物们以往熟悉的那样，陷入另一番混乱。

我曾设想过拉近法国人与自身历史的距离，然而出于谨慎的



考虑，或者说，是一瞬间的觉悟——我不知道——让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如果我真的将它付诸实践，招致的必然会是政治—媒体阶层铺天盖地的愤怒和讽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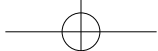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一天晚上，当我正在爱丽舍宫内的卧室里准备就寝时，我陷入了这样一番场景之中：我向奥尔良派的巴黎伯爵提议，在凡尔赛宫蓝金色的栅栏前接见我，以便能同游这座“大世纪”^①时代的伟大宫殿，我并不介意他曾公开表达过对我的政治对手密特朗的支持。稍后，我请求拿破仑王子——波拿巴皇帝的继任者——陪我一起前往参观他父亲的行宫玛拉玛颂城堡。我知道，他会欣然接受。接着，我前往勃艮第的诺莱，参观了“伟大的”拉扎尔·卡诺^②将军的故居。这位在大革命的战斗中“组织胜利的人”的宅邸，依然被完好地保留着。我的古迹之游最后结束于洛林的默兹省，在那里我参观了雷蒙·普恩加莱^③的资本家豪宅，这也是他当年希望隐退后寓居的地方。

当我最终放弃我的这一设想之后，我规避了来自各界的批评与讽刺。这一挫败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历史鸿沟的嶙峋。

① 指法国 17 世纪，以路易十四的统治巅峰期为代表，法国国力异常强盛。——译者注

② 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卡诺（1753 年 5 月 13 日—1823 年 8 月 2 日），法国数学家。他在法国大革命战争中获得伟大的名号——“组织胜利的人”，是极其优秀而成功的军备与后勤天才。——译者注

③ 雷蒙·普恩加莱（1860 年 8 月 20 日—1934 年 10 月 15 日），法国政治家。1912—1913 年担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1913—1920 年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1922—1924 年与 1926—1929 年再次出任总理。——译者注



绝对权力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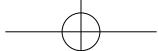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为了缓解两派的纷争，我觉得有必要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一方对权力的过度使用，不至于让另一方感受到对其自身的一种排斥和驱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马上采取了两项举措，来缓解这种权力滥用。

1974年5月30日，在对国会的讲话中，我正式提出了第一项举措，措施的内容按例直接交由国民议会主席——埃德加·富尔先生审阅。这一场景对我而言，是一次颇为感人的巧合。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财政监察员时，正是埃德加先生要我去他的国家预算秘书处帮忙，也是在那里，我学到了职场第一课。时过境迁，今天已换做由老师来正式审阅他当年学生的手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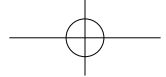
在这份建议中，我希望国民议会恢复曾经的时政问题周例会制度，并要求例会期间，执政多数派与反对党人士享有平等的发言时间。同时，强制要求政府总理和部长参会。在稍后国会开幕时，国民议会修改章程，通过了我的这项提议，这一举措从此现身荧屏，为广大观众所熟知。

紧接着，为了防止议会多数派向少数派过度立法，我随后又提出，自今以后，一部分参议员和众议员——确切地说是 60 名参



议员和 60 名众议员，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应从属于反对派——将有权提请宪法委员会复审一切他们认为有违宪法的法案。这一提议被后来的各个多数派广泛采纳，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它明确划定了立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界线，解放了那些以往总是受害者的少数派，让他们在面对滥权时，不再仅作无声的抗议，进一步让我们的政治争斗变得文明起来。

然而我的这些努力，也只是在万里征程上前进了几小步。为了能走得更远，那些仅试图减少争端，或者在时机成熟时寻求建立平衡关系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希望推翻一切的暴力革命者和寻求支持未果的改革者之间的政治纷争，曾经让一个原本矜持、理性、谦恭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们应该深入探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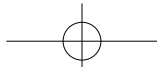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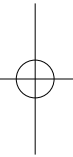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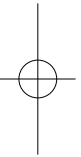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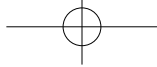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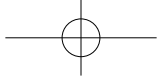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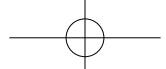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我之前从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叫作法国的国家（倒是有几次从父亲口中听到过拿破仑这个名字，但也仅此而已）。

——中国作家 戴思杰

法国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么？大多数法国人对此深信不疑，很多政治人物也乐于在这幅幻景上大做文章。这种臆想的结果却绝非中性：它误导了国人对于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感知。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定位，他们常常受到来自外界的批评，也更因事情的真实状况而失望不已：世界从不因法国人的意志而运转。

另一个长期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是古代中国。中国的“中”字若以汉语的角度来理解，即意为“中央之国”。我们可以将它拆分为两部分：首先是一个矩形“口”，然后中间的一竖将它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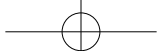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分为两部分——“中”，以此表示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在我看来，中国人心中这种中土之国的想法，主要由如下三个因素所导致：首先是其泱泱之众。庞大的人口数量令其不至于对他国过分担心；其次是它的地理环境。中国的国土被海洋、沙漠和难于逾越的山脉所环绕，这让中国人常常忽视其邻邦的存在，即便存在，也常常被其视作蛮人；最后，是中华文明的优越感，这使得中国人深信，他们无须向外部世界学习。

我们可以试图将法中两国人民的这种心态进行对比，可能不会有更多意义，毕竟两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国情差别。不过，如果我们研读 17 世纪和 19 世纪的法国史，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类似于中国的成分。

首先，当时法国的人口数量雄踞欧洲之首，并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叶。

其次，对于法国六边形的国境而言，三面环海。另外三面之中，一半又是高山。只有东北部一角，完全向邻国敞开。当然，这样的地理结构并不足以让法国完全无视邻国的存在，但这却已经在法国人心中“围出了安全感”，或者正如其他人所说，“安于腴理”。三个半世纪以来，法国的国境线并没有显著变化。其间只有 1870—1918 年间阿尔萨斯-洛林的沦陷、1764 年科西嘉的合并，以及第二帝国时期萨瓦省和尼斯爵地的归附，不过这些领土和法国的关系在这之前便已经很紧密了。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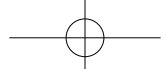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真正凝聚起法国人心中这种“中心”情结的，还应是第三个因素，即通贯 17、18、19 世纪的法国文化及文明。它们在那个时代中光芒夺目，是举世公认的主流，并让其他国家为之倾慕向往。时至今日，它仍萦绕在法国人的记忆之中。

我所说的“其他国家”，是指那些能够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它们所覆盖的范围从太平洋延展到乌拉尔山，并在拉丁美洲继续延伸。

法国的杰出文化在诸多领域得以展现。在家具和内饰领域，法式家居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在当今很多拍卖行的产品花册上，我们始终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一位国际知名拍卖行的负责人告诉我，近些年他们所卖出的工艺品和家居用品中，85% 都出自法国。此外，荣幸也好，不幸也罢，法式宫殿建筑式样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城市中得到了广泛复制，比如马德里、波茨坦或维也纳。而提到精致美食，这更是法国专属，毫无争议。不过，法国对世界尤其突出的贡献是在精神领域，随着法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而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那个年代，拉丁语的应用范围渐渐仅限于宗教活动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英语也还只是英国人自己的语言，仅被不列颠帝国的官员及其美洲殖民地的几百万人所使用。德国、俄国和拉美国家的精英们均使用法语进行写作和表达。直到 1820 年后，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作家才逐渐放弃法语，转而用大众俄文进行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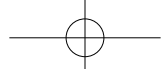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不过在后来的托尔斯泰的小说里，主人公仍常常讲法语，并且绝无任何词汇或语法错误。

法文在当时的政治外交圈同样举足轻重。18 世纪时，大多数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包括当时的俄国外交部长，都选择用法语书写信件。

法语在世界范围内所确立的这种统治地位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代表着一种国家语言可以如同世界语一样，在国际事务中得到广泛应用，它同时意味着，以法语为代表的法国文化传统、法式优雅及其政治原则得以通过语言的媒介一并向世界传播。得益于这一效应，一批法国作家和思想家——从伏尔泰到维克多·雨果——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他们的作品曾经影响了整个时代。当然，他们并不是那个年代唯一的巨匠，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和英国思想家也同样蜚声海内，但是法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丰产，那是一个法兰西巨人辈出的时代，一大批来自法国的时代骄子——“法国学派”，如果我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毫无争议地统治着那个时代。

正是这段辉煌的历史，渐渐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植入了这样的观念，即在有关世界政治历史的讨论中，法国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核心地位。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亦倾向于相信——法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如果细致观察就会发现，这份笃定甚至自负的信念，在法国人自己看来已然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他们何时变得这么自信？他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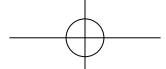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们又会自信到何时呢？我们很难说清这种心态的始与终。或许，我们可以将之追溯到我们常说的“大世纪”伊始，即 1630 年左右，以红衣主教黎塞留所宣称的“国家利益”为标志，正如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著名的著作《外交》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种观念的衰落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它由拿破仑的战败所引发，历经维也纳会议^①的反复，直至 1918 年“一战”停战协定的签署为止。不过即便那时，法国依旧是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导致这一渐进的变化历程的因素，大多已成为了过去时。不过今天的法国人却不愿接受现状，他们从不将其视为国家真实状态的客观反映，亦不会进而分析其后果，他们宁愿紧闭双眼无视这一切。这让法国人深陷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国人仍将法语自诩为一门国际语言。不过，无论是在国内航线的航班上——由巴黎飞马赛也好，飞克莱蒙-费朗也罢，还是在高铁的车厢内，他们听到的都是由法文和英文双语广播的时刻信息，而一旦他们走出国门去乘坐其他大国的交通工具时，法语则连这种待遇也再难享受得到。法语的这种窘境，哪怕只在欧洲大国之中，亦是如此。我犹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双语播报时内心的五味杂陈。不过多说无益，因为这已然为我们所接受。

^① 维也纳会议是从 1814 年 9 月 18 日到 1815 年 6 月 9 日之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其目的在于解决由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导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保证欧洲的长久和平。——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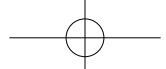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英语成为当今世界主要的商务语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当代新式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英语的主导优势变得更加明显，当代科技领域也同样采纳英语作为主流用语。记得当我们的国民议会主席好心地为各位议员席接线上网时，我却发现自己电脑屏幕上的大多数指令都是英文。就连我们的很多研究学者，为了能更好地在国际领域沟通其学术成果，都已开始使用英文撰写自己的论文。尽管有些强制使用法文用语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毕竟少之又少。

1945 年时，法语仍是公认的联合国三大工作语言之一。时至今日，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如果今天我们置身纽约这个国际文化之都的图书馆中，或者是前往柏林，参观那些在历史上曾深受胡格诺派影响并长期坚持用法文刊印的出版社，我们已然找不到任何一本法语出版物，就连部分作品的法文译本，找起来恐怕也是大海捞针了。如果说有例外的话，很多旅游指南和美食书籍所使用的倒是地道的法语。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周期性再版的法国经典著作了，常见的有巴尔扎克、大仲马和雨果的作品。法国最后能继续享有这种国际声誉的作家，恐怕只剩下阿尔伯特·加缪和安德烈·马尔罗^①了，不

^① 安德烈·马尔罗，法国著名作家、文化人，曾任戴高乐时代法国文化部长，且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代表作小说《人类的命运》，详述上海“四·一二”事件，颇受好评，且因此荣获 1933 年当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逝后葬于法国巴黎先贤祠。——译者注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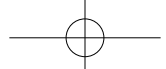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过他们的成就与其说是因为其作品，倒不如说是源于他们自身的人格魅力。

这里，我们可能已经触及了这一变化的一个核心点，即过去三个世纪以来，法国文学及哲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们切入了当时社会争论的议题，让每个人都自感与其紧密关联。

启蒙时期的著作，一如后来 19 世纪的作品一样，皆通过一种全新的形式，触碰到了那个大多数国家都必须直面的课题：如何将国家由专制或封建体制向民主政治过渡？

这期间法国的特殊之处，或者说法国作家的一个优势，在于国家在百年间完整地经历了两个历史轮回：第一个轮回发生于 1789—1815 年期间，法国经历了从路易十四的绝对君主制，到 1790 年的君主立宪制，再到雅各宾专政，直至后来的议会督政，最终回归到了拿破仑帝国皇权专制统治的这一循环。而第二个轮回与其极其类似：1824—1876 年之间，查理十世复辟了专制统治，随后是路易·斐利浦的君主立宪制时期，紧接着是 1848 年的共和革命，直至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至此完成了君主专制的又一次循环往复。不过帝国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终得以确立下来。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给法国的政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其能够对国家体制的更替进行恣情评论或批评。



这期间的著名作家有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托克维尔^①。在他们之后，还有孔德^②，勒南和丹纳^③。得益于法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们作品的价值均得到了普遍公认。

面对剧烈的社会动荡，法国的政论作家首先觉察到了新生的工业化进程对于社会运转和人口结构的影响。他们曾设想建立一种交替式的制度，比如圣西门^④和普鲁东^⑤，他们亦深情着墨，致力于唤醒领导人的社会良知，呼吁他们关注工业革命初期时劳工惨无人道的生存条件。雨果和左拉即是这样的作家，他们因其作品的见地和其中饱含的炽烈情感而享誉国内外，并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相比肩。

法国文人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与各自时代的重大社会议题相关联，比如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的政治过渡，以及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转型等。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够在从事纯文字性工作的同时，对时政问题亦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使得他们常常“双喜临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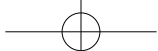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① 亚历西斯·夏尔·昂利·克雷莱尔·德·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是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及历史学家。——译者注

② 奥古斯特·孔德（1798年1月19日—1857年9月5日）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③ 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1828年4月21日—1893年3月5日），法国评论家与史学家，实证史学的代表。——译者注

④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1760年10月17日—1825年5月19日）是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⑤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1809年1月15日—1865年1月19日），法国互惠共生论经济学家，首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其政治学说被视为是无政府互助主义。——译者注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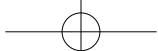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即在文学和社会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光环夺目。

今天，法国的思想成果已很难向外输出。除了一些仅有的哲学理论作品外，法国在世界思想领域的定位已很少会带来实质影响。这或许正解释了一个现象，即两个世纪以来法国人持续关切的两个议题——政治过渡和工业社会转型，在当今法国人眼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解决，并已经成为了过去时。与此同时，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人们关注的重点随之转移。我想，如果法国的文学、哲学作品能够着眼于战后的各种新局面、新状况，努力摆脱那些源自世纪之初的旧话题的话，那么终有一天，它们还会重拾曾经的影响力。同时，它们亦应该更多地面向未来。要知道历史上那些曾经的巨匠，从伏尔泰到马尔罗，都是面向未来的理论家，或者说是未来的梦想家。然而今天，他们当年的位置一直无人继承。不过无论如何，即便我们要与其他人一起共担这份使命，我们也应将其付诸实践。

法语地位的滑坡，以及法国思想影响力的丧失，是殊途同归的两个现象，尽管它们各自的成因不尽相同。因此当我们勾画自身在当今世界中的角色时，我们应当表现出更多的节制。角色的内容已经发生改变，但无论怎样变化，都已不会再像我们自认为的那样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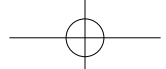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对现实的不断拒绝

面对法国这种中心角色的丧失，政治人物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一些人会通过煽动性的宣传来满足民众的虚荣心；另一些人的做法相对“真诚些”，他们一方面积极重申着法国的至上地位，另一方面，他们自认为可以带领法国重回曾经的辉煌。

这一点上，戴高乐将军是有别于今人的，因为他曾亲眼目睹了 1940 年的军事浩劫及其随之而来的国土沦陷！——自日耳曼人和亚洲游牧部落的两次入侵后，法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占领（即便是百年战争^①期间，法国也不过只沦陷了中部和东南部的领土！）。戴高乐的最终目标是恢复法国在“一战”结束后的强国地位。他对一个伟大法国的热情呼唤旨在明确地教育国民：重拾国家因战败而丧失的地位。而他与美英之间所发生的争执，同样出于为法国赢回战前对等影响力的考虑。戴高乐将军绝非沉迷臆想，他是在实实在在地重建法国的殊荣。

相形之下，当今的政治领导人在公众眼中的作为只是在歪曲法国的实际地位。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惯常施以两种伎俩，一

^① 1337—1453 年，交战双方是英格兰和法国，后来又加入勃艮第等。它是世界史上最长的战争之一，长达 116 年，最后法国胜出。——译者注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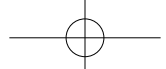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个令人发笑；另一个，则令人憎恶。

第一种伎俩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旨在维持国人心中的一种错觉，即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法式典范”，其他国家对此心怀妒忌却又纷纷效仿。对于那些沉醉于这种微醺之境的同胞，或者说那些在议会之中为之鼓掌喝彩的议员们，我其实并不想刺痛他们敏感的神经。但我仍有义务告诉他们，在我隐退的这些年里——尽管我并不想离开这个舞台——我游历了世界各地，但我从未在任何一篇社论中，或者任何一次会议期间找到过这些著名的“法式典范”的影子，我也从未见到过那些对其所谓的热情追随者。为了印证我的这番表态，我可以请求所有那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的同胞为我作证。

让我们认清这一点吧：过去诸位总理们口中常常提到的“法式范例”仅仅是一种政治说辞，它已招致民众广泛的怀疑甚至不屑。相反，真正为外部世界所承认的，其实是法式生活样式，只有这一点才值得我们深入发掘。法式优质生活的含义不仅局限于物质领域，它亦延伸至文化层面，比如说它对人身自由问题所持的宽容和审慎态度。它为当今法国立足世界构建了强大的王牌，这一点，后面有机会我会继续探讨。

至于第二种可鄙的伎俩在于它力图使民众相信，世上真的存在一种“法式特例”。这一伎俩也已经为政客所广泛使用。我之所以认为它是邪恶的，在于它已将国人的思维引向了错误的轨道，



似乎在这条轨道上，法国才可以摆脱那些已为其他国家所接受，或者说正在经历的束缚和限制。又仿佛在经历过这一连串的社会学、心理学复杂变化后，那些支配社会大部分经济活动的科学法则——竞争力法则、竞争规则、劳动成本原则，以及产品定价机制——在法国均不再有效，至少是和其他国家的条件不再类同。这就是所谓的“法式特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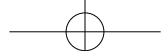
一切对于这种特例的合理解释都是徒劳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位英国科学家——当年我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学习时的一位老师——在一次休息的场合对我们所说的一段不寻常的话：

“我们所称之为‘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对法则正确性的亲身实证。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牛顿定律，并且推开窗子跳了下去，他这一跳本身就符合了万有引力定律。”

法国人循着“特例”道路越走越远，直接后果就是他们逐渐远离了现实。这种对现实的拒绝，或者说在做决定、下结论前缺乏科学统计和专心研究的态度，在我看来，是导致法国政治衰落第二股潮流。

我们的领导人所坚持的法国中心论，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外交这个特别领域，一切源自于我们自身态度和动机的想法，都应该与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形成比较，因为它们常常相形甚远。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国民只能通过国内新闻媒体的报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道猎取信息，却很难知晓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真实想法，尽管新式通信手段的出现会让这一状况有所改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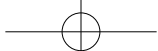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执念在于它试图参与各类事务。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总要自问：法国在这之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比如就在几年前，法国曾为能列席新一届“东南亚国家会议”而做出了艰苦的外交努力，然而法国的这一愿景其实并不受欢迎，我们的地理位置也让这一切都显得没什么必要。

1993年中右派选举胜利后，我当选为国家外事委员会主席，那时我曾尝试组织一场辩论。我希望能够通过该委员会起草一份报告，阐明法国对外进行军事介入的相关条件，并进一步定义“法国国家利益”这一概念。

确实，当今法国海外军事行动的次数正在显著增多。它们有时是多国联合行动的一部分，有时则是法国的单边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常常因某些新闻画面在舆论之中造成的情绪效应而引发。同时，单边行动和跨国联合行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这份报告最终被提交给了时任外交部长的让·贝尔纳·雷蒙。雷蒙先生是一位充满智慧又不失庄重的人，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曾在蓬皮杜总统任期内专事外事文件的缮制工作。针对我的这份报告，雷蒙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委员会，其成员均是来自国会两派的议员。

事后，我让专门前去做汇报的报告人告诉我委员会最后的结论。



我一心希望他们能就“法国国家利益”做如下定义：法国本土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这一情况应涵盖两个层级：第一个层面，法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国家经济命脉处于危险境地，或者法国的盟友受到了危险；第二个层面，国际事件的性质及其与法国的远近关系，并不威胁法国的国家利益，进而也不需要法国进行军事干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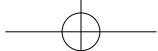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报告的评审结果却不是这样，委员会认为，国际上所出现的任何状况，无论它事发何处，都可能危及法国的国家利益。

不论我怎样坚持，我均未能改变委员会的立场。他们拒绝定义那些能使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的地域或场合。尽管雷蒙先生面容依旧温和，态度依旧诚恳，但他却始终坚持认为，为了保证国家利益在世界各地免受威胁，法国有必要因此而采取相关军事行动。

最后，我放弃了对他的劝服，这份报告也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次的经历让我确信，尽管我们的国之栋梁们从不会将国家利益与当今世界各种政治的、民族的、社会的或者是宗教的问题相混淆，但他们亦不可能说清楚，我们的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

—— 过时的逻辑 ——

关于法国对于国际现实的错解，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与领导人处理旧殖民地遗留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态度有关，其中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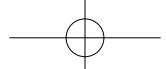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一个典型事例，就是马约特岛的独立问题。

法国从不正面回应时下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当我在任总统时，我曾希望结束这一状况，阿法斯和埃萨斯的独立正是这期间的成果之一。在这块被我们称之为“法属索马利兰”的古老土地上，96%的人口为沙菲耶派穆斯林。1880年，出于那个时代的纯战略考虑，法国夺取了这块土地。直至1977年，经过艰巨的政治斗争，98.7%的当地民众投票支持独立，这块旧殖民地随即变成了现在的吉布提共和国。法国也因此得以从非洲之角^①的一系列纷争中脱身。

科摩罗群岛的情况也与其类似。科摩罗地处莫桑比克海峡，介于马达加斯加岛和非洲大陆之间。群岛包括四个组成岛屿，它们从7世纪起就已开始伊斯兰化，形成了众多酋长国。1841年，法国买下了其中的马约特岛，随后，伴随着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殖民占领，法国亦同步夺取了剩下的其他三座岛屿，并将其一并归入马达加斯加总督的治下。直至1947年，科摩罗取得自治，并在1958年予以正式确认。

1972年，科摩罗当地议会要求从法国独立。法国对此并无反对之意，并于1974年就此问题在当地举行全民公决。95%的科摩罗人倾向于独立，但是，作为科摩罗人口第三大岛的马约特岛，

^① 非洲之角包括了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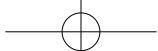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其反对独立的投票比重却高于支持率。在此情况下，科摩罗议会仍在 1975 年宣布四岛独立，但马约特拒绝承认这一决议。对此，法国国会批准了科摩罗的独立决议，同时赋予马约特独立自决权。在新一轮全民公决中，马约特民众继续普遍支持留在法国版图内。这里要说，在新成立的科摩罗联盟中，总统由革命委员会直接任命而成，而后者为了维护既得局面，不惜采取一系列极端手段。在此之时，联合国接纳了科摩罗为其成员国，但强调要维护其所辖四岛的统一。随后，在 1976 年，联合国大会谴责马约特岛的公投结果，并要求法国立即从该岛撤出。

自 80 年代开始，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通过多数决议，要求法国政府“加快谈判进程，让马约特真正回归到科摩罗联盟之中”。

这时的法国，基本上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看待马约特问题。这是基于一部分政治家的态度：“我们无权抛弃那些想继续做法国公民的人。”

从这一态度中，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对于现实情况的错误认识。马约特人并非想继续做法国公民！他们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置身于其他科摩罗人所陷入的桎梏之中。马约特历史上曾经是科摩罗的首都，而独立之后的科摩罗，却陷入了一系列的动荡。国民革命委员会夺权后，焚毁了文档，将公民法定选举年龄降至 14 岁。它先后任命了两名总统，此二人却又相继被杀害。以此看来，马约特岛民只是想在法国的保护下活得更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安全些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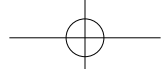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法国却没有继续坚持其阶段性的自卫立场。它不再赋予马约特人二选一的选项——要么回归科摩罗，要么继续观望；也不再继续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挑衅。随着事态的发展，法国逐渐自闭于一种不切实际的逻辑中：它分配给马约特一个参议员席和一个众议员席，似乎这样一来，五万马约特岛民就能在国会中更具代表力。一些人甚至还打算干脆将马约特变成一个新的海外省，可是，无论是法国的领土权、文化，还是其殖民占领的时长，都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一选择让法国遭到了来自联合国大会的数次严厉批评，而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于此也毫无所得。

诚然，这仅是一个意义不甚深远的例子。但它却很好地刻画了当今政治阶层中一部分人的形象：他们站在国家层面歪曲事实，美化说辞，以此绑架民意，让民众不再能从世界的持续变化中感受到其影响。

法国对“角色定位”所表现出来的这份执着，让我们成为口头上的超级行动派，也让我们总是沉迷于各种“提议”之中。

对于国际上所发生的任何事端，我们的领导人们——当然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均会自命不凡地进行表态，或者对之做出批示。他们的表态会被我们的媒体毕恭毕敬地收集整理好，只不过这番表态极少能被他们的受众所听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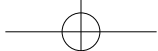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那些由法国所提出的“提议”，值得我们为它们专门建一个



名册。它们多到可以填满大图书馆内的一栋楼,或者一整面书柜了。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已然有了这种传统——各届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都会提出一份“法国计划”。一些提案,尤其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提案,曾经慷慨大方得很。不过可笑的是,我们随后用在实践上的努力却让人大跌眼镜。我们的代表会以国家财政困难为理由,或者延迟这些计划的实施,或者稀释这些计划的内容,直到让法国彻底跳出计划之外,不再继续参加,尽管这份计划就是上届大会时由法国提出的!

我本人也没能走出这个滑稽的怪圈,不过那是因为我始终相信,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一种特殊能力,使其能够设计并提出一些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创想,以回应时代的诉求。但后来我不得不陷入了那份潜规则中:永远不要提那些能够被实现的提案!我们的提议,就像在木桶里敲一声所带来的回响那样,会绕回到我们身边,让我们给人以一种不识国际时务的印象,或者说让别人觉得,法国人挖空心思得到的,不过是一幅华而不实的表象。

1975年11月,当我着手准备朗布依埃会议——G7峰会(全球七大工业国家首脑峰会)的前身,此后每年都会举行首脑峰会——的时候,由于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基辛格的积极努力,这项计划得到了德国和美国的大力支持。对此我欣慰不已,因为这样一来,计划总不至于招致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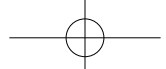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同样地，为了缓和第一次石油危机^①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又提出了“南北对话”的解决方案。这一提议由外交部长让·索瓦尼亚格和常驻联合国代表路易·德·吉兰戈牵头实施，其准备过程也是极其细致的。14 个月后，我正式提议召集三大国家集团的代表（石油输出国、发达石油消费国和发展中石油消费国）共同与会。1975 年 12 月 16 日，首届“南北对话”在位于巴黎克勒贝尔大街的马杰思提克饭店正式召开。我至今仍记得那次大会的过程，在我们和当时的沙特王子，即现在的沙特国王——法赫德先生的共同努力下，会议最终达成共识：由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当中的发达国家和“七十七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各指派一个国家代表，作为大会的联合主席国。

当时与会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一共有 19 个，其中 7 个国家是“欧佩克”组织的产油国；而发达工业化国家共有 9 个，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当时的欧共体国家。正是在那次大会上，后者首次决定以统一代表团的身份参会。

唯独苏联缺席了那次大会，显然，“冷战”使然！不过难得的是，当那年 4 月我到访阿尔及利亚时，布迈丁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②，均一改以往的缄默，决定应

① 第一次石油危机从 1973 年延续至 1974 年，又称作 1973 年石油危机，由于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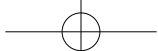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② 现任阿尔及利亚总统。——译者注



邀参会。那届大会决议创立四个委员会。能源委员会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同主持，发展委员会则由阿尔及利亚和欧共体共同主持——极具象征意义的组合！首届“南北对话”进行得非常顺利，该对话也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末方画上句号。

我之所以列举这个例子，也许有一些追思个人过往的成分，不过它同时也是为了向你们指出，法国的那些设想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现在的法国早已不再能发号施令，但它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法国应向外界证明自己绝非孤立，它可以召集足够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并诚挚地邀请它们结伴而行。它也应警惕陷入两种危险境地：一方面，要避免自身的政治或预算能力不足以支撑其构想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做足功课，避免所提的建议成为空谈。

可以一并举两个这方面的例子，一个是密特朗总统在 1982 年的坎昆会议上所提出的，旨在促进发展的一揽子援助方案。这是一份颇为慷慨的提案，然而两年后便因法郎的贬值而夭折；另一个，是就中东和平问题召开专项国际会议的提议。这一想法由穆巴拉克总统和希拉克总统于 1997 年的开罗会晤后共同提出，当时的美国和以色列却均反应冷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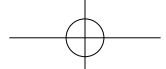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法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不过，当今世界的现实结构不应让我们因此闷闷不乐。如果说它结束我们心中那副自诩为世界中心的不实幻景的话，它同时也为今天的法国开启了一方崭新的天地。

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呢？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军事、经济、技术，甚至是文化领域，不管“文化”一词在这里用起来多么蹩脚，至少在大众消费文化层面，美国就是无可争议的霸主。这独霸的态势在苏联帝国解体后慢慢形成。苏联作为曾经的军事超级大国，也已成为了过去的存在，尽管它当年展现出了空前的军事强国的表象，但依旧不过是如面具一般的障眼法而已。在万众惊愕之中，苏联轰然倒塌，世界随即展现出一幅全新的景象：面对旧帝国倾覆后的瓦砾，世界只剩下一位巨人在依旧矗立，那就是美国。

当今世界需要继续维持这一态势。在美国之后，还有两个超级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它们各自拥有近 15 亿人口，近年来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就其自身而言，它们应该说仍处在发展中期阶段。这使得它们还不能完全担负自己的责任。或许在未来几十年中——也许对中国人来说，他们还需要五十年，但前提是发展不会遭遇反复，亦不会因此而发生延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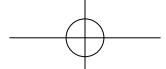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与上述两个未来潜力大国比肩的，或者说排名稍稍比它们靠前的，是中等人口发达工业化国家阵营，它们的人口数量介于六千万到一亿之间，按从多至少的顺序看来，分别是日本、德国和法国。法国在这一集团之中位于第三位，其人口数量不足日本人口的一半，经济总量亦低于德国的三分之一。

在这之后，是另一发达国家集团，分别由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组成，但它们与前一阵营间相距不远。在它们之后，是两个发展中大国，即巴西与墨西哥。

这一排名马上会暴露出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法国依旧位列“三国集团”当中，这使得我们必须付出坚定的努力以保持追赶的姿态。事实上，其他国家对法国的这一排名并不感冒。如果我们浏览美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的地方杂志，我们不难找到有关日元和德国马克的行情信息，但却毫无有关法郎的只言片语。这样看来，法国的真实位置其实应该是我们身后的那一集团。当然这依旧是个不错的位置，权作一种妥协吧。

我仍记得当年的一番情景：那时我向戴高乐将军建议，国家应以赶超英国的经济潜力为目标，因为那时的英国确已领先我们。将军用一种在报端之上不多见的斜视眼神瞟了我一眼，回答道：“这是个好主意，你可以一直试试！”

时至今日，透过近年来的欧洲统计数据来看，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显著地超过了英国。尽管 1999 年至 2000 年之间，欧元汇率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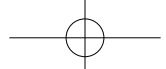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发生了 15% 的贬值，而英镑依然居高不下。这些纯货币因素使得这一结果表面上又发生了逆转，两国实力态势的大方向依旧不曾改变。

未来几年内，法国政治经济的首要任务在于缩短与日德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我们要说，尽管现有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使得这份差距逐步缩小，但这不是今日法国应有的表现。对业内人士而言，也许我们可以尽力延展国民经济，重点扶植领域的既得产业优势，这在计划层面上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目标；然而要看到，这一目标却有失方向感，或者说在国家利益层面上，缺乏远期前景。

对法国而言，拉近与日德两国间的距离并非是一个力所不及的任务，因为人口因素对后二者而言非常不利。比如就日本来说，人口问题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据日本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日本人口数量未来将会大幅度下降，从目前的 1.26 亿降至 2050 年时的 1 亿，而到 2100 年时，仅会有 6700 万人。同样地，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在未来五十年内，以每年减少 65 万的速度下降。对于德国来说，人口因素同样也会为其带来消极影响。其现有的生育率水平已无法满足人口更新换代的需求，这使得德国从现在开始就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这却是整个欧洲在二十年后才须共同面对的普遍问题。

相形之下，法国在人口增长方面却仍保有余力，并可以相对容易地将之调动发挥出来。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比如减少对低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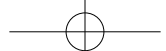
入者和金融再投资行为的课税，并能在财政预算方面为其予以必要支撑的话——一旦考虑到地方行政机构的冗叠和繁杂，这便是完全可行的——我们就会见证国家人口实质性的增长，我们也会轻松地达到西班牙现有的增长水平。

这种人口增长余力的存在，部分得益于 1992—1997 年这五年之间的持续蓄力。那时的法国依旧奉行通缩货币政策，法郎比价被不实高估。尽管我在各类公开或私人场合均对此表达了我的忧虑，但仍旧未能动摇高层人士的态度，好在这一政策在欧元正式生效后得到了及时纠正。另外，人口增长的余力也部分受益于新式服务业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这些领域诞生了一批极富活力和创造力的新生代企业家。

上述国际态势证明，自 1974 年以来已持续二十余年的法德友好，并非泛泛空谈，更不是基于部分领导人个人倾向的产物。它旨在开辟西方世界的第二经济增长极，虽然依旧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已然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这一切赋予了法德同盟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制定决策、提出创见的神圣使命，G7 峰会的创建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地，在 70 年代一系列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垮塌的货币事件中，我们亦能感受到法德同盟的能量。

美元贬值及其所引发的货币浮动，以及随后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决定，乃至欧元的最终创建，无不得益于法德两国的合力贡献。

今天的法国仍旧自困于其传统外交理念中。它全方位染指各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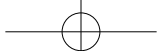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类国际事务，反感在它们当中做出必要的选择，在法国看来，选择就意味着放弃。

事实结果是，法国分散了其有限的政治和财力资源，而它自身的外交行动亦缺乏可读性。法国希图在全世界显示存在，并试图在各项国际议题上进行介入，结果都只是在问题的实际进程中施加了极小的影响。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在外交领域也是客观存在的。一国的外交政策如果是由政治人物而非行政机构所主导的，那么它一定会致力于做出自己的细致判断和选择：如遇军事威胁，它必会选择结盟政策；若力图为国家的未来影响力积蓄力量，它则会选择与相关国家建立特殊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过去的十年中，法国并未能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临界点上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即刻与波兰建立紧密联系；也未能在新一届西班牙政府决定加入欧元区时，深化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

在我看来，未来几十年中，有三个首要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法美关系的走向、法国如何参与欧盟事务，以及面对世界正在行进中的各类变化，尤其是亚非事务时的着眼点。我们分析问题和采取行动的方式，均应依托于对自身处境和现有能力的正确评估，而绝不应简单借力于一种自负的考虑。同时，我们亦要立足于法国自身，秉持一个成熟大国的优越感，以及基于自身卓越历史文化传统的那份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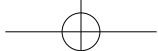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自主的伙伴关系——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许在日后中国登上世界舞台之前，美国仍将继续被冠以这个头衔。在我看来，将美国称为“巨型大国”更为贴切，它客观上包含体量巨大的意思，而“超级大国”一词让人联想到的是一种优越性的概念，或者说是统治力。

这个“巨型大国”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如果不嫌我啰唆的话，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即法国当年在美国独立进程中是做出了贡献的。1976年时，我也曾亲自前往美国参加其独立二百周年的纪念仪式。另外，历史上美国也曾两次对我们施以援手：1917年，美国向洛林地区派出部队，彻底粉碎了德国最后的取胜幻想；时隔27年之后的1944年，美军付出巨大伤亡代价进行了诺曼底登陆，最终使法国得以光复。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所执导的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清晰展现了美军当年可歌可泣的壮举。

我们秉持着同样的民主信念并相互借鉴，我们均坚定地忠于自由，同样地，我们也都尊重人权。

所有这些本该在两个国家间形成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国力是不对等的，坐拥超强实力的美国实际上自行其道。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具备巨型国力的美国，常常让人搞不清楚它将如何系统地将实力运用到外交实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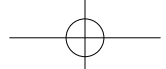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历史上，美国曾多次订立国家外交政策的原则，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门罗主义”。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指出，“美国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美洲大陆所进行的干涉，并将不惜以牺牲武力为代价”。紧接着是“一战”结束后所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它旨在维护战后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①。亨利·基辛格曾这样总结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天赋异禀，具有他国无法匹敌的道德底蕴与无上权威。美国对其自身实力、以及对其行动目的的道义性具有无比的自信，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为捍卫其价值观而进行斗争。”

1946年2月，面对苏联的威胁，理论学者乔治·凯南在他的一封“长电报”中向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个人建议，后者最终演变为著名的“围堵政策”^②。

“冷战”结束后，美国又接连采取了一些短期的外交理念。乔治·布什总统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说法，但这一构想的定义一直未能明确。这期间，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也经历了一系列

①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筹建了国际联盟并将其写入《凡尔赛条约》，正式结束了“一战”。

② 这一政策深化了一个基本对策，即当苏联每一次试图扩展其政治影响力的时候，美国均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向其施以重压。



紧张阶段。最近，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又提出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新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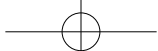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当我们向美方的外交官员提问，为何美国在对外交政策进行系统阐述这一问题上总是缺位时，后者既不感到惊奇，也未尝有丝毫不安。他们对此不予置评，即便是他们当中最足智多谋的人士，也不发表任何见解。

一位欧盟外长曾对此评论道：“恰恰相反！美国人的外交主义再明确不过，那就是他们的实力观，他们对此无须另加解释。”

就此问题，请允许我稍作修正。如果说美国的国力的确足以引领其外交政策的话，这事实上是指美国依旧奉行威尔逊主义，他们认定在国际关系事务中存在“好”与“坏”两个方面，而美国则是有能力对此进行甄别的国家。以今天美国的视角看来，如果一国政府践行民主选举制度、尊重人权，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便是“好”的表现，美国便会自发地服务于这样的国家。而如果一国的行为与以上原则相冲突，美国也会自发地与之敌对。

面对这样的美国，法国何去何从？

法国领导人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区别之处在于，他们自问该遵从怎样的路线，这也是他们值得称道之处。然而他们的思考常常起始于一些失真的模糊回忆：当年，面对罗斯福总统对自己强加支配的企图，面对美国残暴的、反社会的帝国主义式敌对偏见，戴高乐将军对法国坚持独立自主国家路线的意图进行了坚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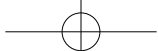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定不移的重申。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回顾和思考，后来的法国领导人虽未正式言明，但均秉持一种态度，即在国际制度框架内对美式强权予以钳制。联合国就是对抗美国滥用实力行为的一个极好的手段。同样地，世界贸易组织也是一个有效工具，不过它的自主性常常受到质疑。在世贸组织体系内，法国致力于得到其欧洲盟友的支持，尽管后者常常表现得犹豫不决。

不过对于这种态度的正确性，我本人不敢苟同。尽管在国际外交场合，我们会试图用糖衣包裹这种心态，或者在两国元首每一次会晤时，媒体总会刻意用近乎荒谬的辞藻宣称“对抗的思潮已然成为过去时”。但它在本质上所展现的仍旧是一种对抗姿态。

这种对抗心态虽然部分迎合了法国人的天性，但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它令人身心俱疲，因为我们不得不持续坚持同一立场。其次，它让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已然树立的负面形象更加根深蒂固，正如美国民众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会质问法国坚持这种对抗态度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更不用说会去理解。最后，它也令我们同欧洲盟国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它们一方面不确定是否要趋附我们的主张；另一方面亦不想看到这种对立扩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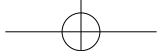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法国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即尝试去经营这种独立自主的伙伴关系。在行动层面，我们要力图在自主原则和外交定位之间搭建关联。国家的自主性是建立在对法国身份地位的认同以及法国经济（须进一步增强！）社会均衡运行这一基础之上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外交定位应避免模棱两可，以确保民主价值观这一核心不受损害。面对美国的巨型国家实力，我们既不要心怀成见，也无须充满敌意，因为两国所奉行的政治原则是一致的，只不过法国人要自行勾画自己的行动路线。法国绝不会采取“自动尾巴主义”政策，我们会本着十足的伙伴精神，细致审视我们每一次行动的内容及其局限性。当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美国伙伴一致时，我们应感到高兴；而如果双方发生了分歧，我们应努力寻找达成理性妥协的可行性。如果这种可行性是存在的，我们就要与所有认同我们主张的国家一起坚持我们的立场，但绝不要试图组织“反对者同盟”。

这一政策的外在形式与本质意图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可以更加清晰地彰显法国的自决性，也避免了双方的相互挑衅与彼此曲解。

我不想在外交问题上着太多笔墨，因为这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过作为话题的结尾，我仅最后再说一件事。对于法国重新恢复在北约内部军事存在的做法，我本人不敢苟同。在我个人看来，这有悖于法国外交政策的底线。这种军事上的靠近削弱了我们的自主性，会引发社会舆论对其目的性展开又一轮毫无意义的争论，而实际上这一选择本就是毫无意义的。有观点认为，法国的这一姿态，意在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得以最终通过做先期铺垫，然而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英国在这一问题上所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发生的 180 度的态度转变——这一转变其实是积极的——也许正说明了二者其实毫无关系。

我衷心地希望，国际社会在审视法国对美关系行为的时候，会逐步地从“独立自主伙伴关系”的角度进行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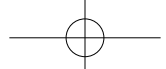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法国在欧洲——

对法国而言，第二个重大议题是它在欧盟中的位置。

当年，面对依旧烟火未烬、四下残垣断壁的欧洲，几位战后领导人毅然提出了法德和解和建立欧盟的创想。时至今日，对于他们当年所表现出的创造力、勇气及所展现的真知灼见，我们却未能给予公允的评价。

1978 年，我参加了在时钟沙龙召开的纪念罗伯特·舒曼^①计划诞生三十周年的仪式。与会期间，人们的注意力突然被一声轻微的口哨声吸引了过去，与此同时，场内安保人员误以为是炸弹的引信使然，即刻进入警戒状态。后来发现，这所谓的“引信”

^① 罗伯特·舒曼（1886 年 6 月 29 日—1963 年 9 月 4 日），法国政治家，曾担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以他名字命名的“舒曼计划”为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他和让·莫内（Jean Monnet）一起被称为“欧盟之父”。他出任了欧洲议会的第一任议长。——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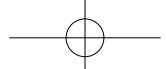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声只不过是鼾声，这位当事的某国总理不堪台上的长篇大论，昏昏然睡去，使得大家虚惊一场。

1950—1980 年之间，欧盟创建计划得以紧锣密鼓地进行，并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一期间的相关工作携有浓重的法国烙印，法国领导人曾多次阐述这一计划的动机，并展现出了有能力引领该计划走向成功的决心。这一计划旨在将欧洲范围内同类国家聚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以横亘在欧洲东部的铁幕为边界，将历史上曾同为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子民，以及日后那些无论是曾主动依附还是被动征服，但最终均纳入拿破仑帝国版图的人民重新凝聚在一起。诚然，这些成员国在历史上均有过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倒退，但它们自身文明及文化的一致性却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这个统一欧洲计划的宗旨，在于慢慢地让域内各成员国以统一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同时积极探寻一个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以期让各国在历史上业已存在的一致性得以续存。

在该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法国游刃有余，动力十足。当时依旧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也透过这一计划看到了消除自身历史污点、重归国际社会的方法。可以说，这一全新的同盟体极具说服力，深得人心，它同时激发了广大青年人的极大的热情。

这一计划当年差点就成功了！当时，有识之士多次重申，应赶在德国最终统一之前完成欧盟的创立。不过当该计划在 80 年代行进到最后一步，即为政治统一定义内容之时，英国首相玛格丽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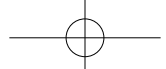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特·撒切尔夫人却对此表达了她毫不动摇的反对态度，而科尔总理与密特朗总统在此情况下亦不想强作决定，最终选择了另寻他法。再后来，两德最终顺利完成了统一，而欧盟计划却依旧未能成型。

此后，法国及其伙伴所面对的已然是一个全新的态势，我们已无法规避现实，而力图再次运用旧手段实现欧盟统一的想法也已是徒然而已。

这一新态势要求我们进行战略思考，或者说进行远期规划。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扩大化趋势，欧盟创建的初衷将不再仅限于将同类国家聚合在一起，而应将那些不同类的国家亦纳入其范围。然而联盟的集成度显然会因此而降低，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便可以一目了然： $I \cdot E = \text{恒定}$ 。这里的“ I ”代表集成度，“ E ”代表参加国数量，也就是说，联盟集成度 $\times$ 成员国数量 = 联盟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不能采取一些恰当的措施，创建欧盟的初衷很可能最终仅演变成一个类似欧洲会议一样的存在。它或许也可以统辖一个广阔的市场，实现域内成员国政府间的合作，但其统一的决策能力却将非常之弱。另一个较之更坏的状况是，欧盟将最终演变成一个集合联盟共同机构和各独立国家机关的联合体，它错综复杂、运营成本高昂，会使民众的态度慢慢地由最初的漠不关心变为充满敌意，直至将其最终抛弃。

本书的议题，同样也不在于分析欧盟所面临的机遇与风险。



不过，通过对欧盟统一进程的回顾，总结经验教训并审视法国自身的政治衰落却是本书的题中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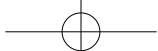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首先要承认一个客观事实：法国自身的建议及创新能力已然衰退。

一些早期的计划，如欧洲煤铁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均是由法国首先提出的。尽管这些计划的实施后来都广泛征求了后续成员国的意见，但计划的实施团队仍主要由法国人组成，比如让·莫奈、罗伯特·舒曼、贝尔纳·克拉皮耶，以及其他几位成员。

当成员国扩展到了六个国家后，共同体内部就采取了相应的竞争协作机制，很多他国人选由此亦为我们所熟知，如德国总理阿登纳、意大利总理加斯佩利，以及比利时首相保罗·亨利·斯巴克，共同体的行动也更加体现出了集体意志。但是诸多关键的决策，无论事后看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仍然出自法国代表之手。

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也正是因为 1954 年 8 月 30 日皮埃尔·门德斯政府的拒绝，最终以流产告终。不过现在看来，应该说当年的这个防务共同体本身就是个早产儿吧。

至于《罗马条约》的订立，法国谈判代表当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条约内容的价值至今仍经久不衰。同样地，1962 年在戴高乐将军主持下所签署的法德《爱丽舍条约》也同样值得回味，这一条约为日后的法德友好构建了制度根基。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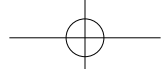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此外还是戴高乐将军，当年不顾其他五个成员国的反对，力排众议，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

总而言之，无论法国曾提出过怎样的建议构想，或者表达过怎样的反对拒绝，法国过去一直在各类欧洲议题的辩论中处于中心位置。

这一状况在 70 年代亦得以延续，因为法国在两项重大进步议题上展现出了极高的参与度：一个是 1974 年 12 月诞生于爱丽舍宫的欧洲理事会，它后来演变为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另一个是建立欧洲统一货币体系，其中包括创建统一货币埃居。这一项目在 1978 年和 1979 年得到了法德两国的共同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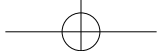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然而此后的日子里，法国的推动力便遭到了减弱。法国错失了两个好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法国眼看着这两个机会从眼前经过，却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去把握它们。

1983—1984 年之间，欧洲范围内所讨论的核心议题是欧盟的立法内容。各成员国寻求订立一份类似于宪法性质的基础性条约，以期在制度上确立一个“新欧洲”的存在，如果这个表述不至于过于令人惊愕的话。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开始于 1979 年欧洲议会普选结束后，后者的完成标志着建设欧盟大厦所期盼已久的那一块承重石也顺利到位。欧洲议会随即着手拟定了《欧洲联盟条约草案》，该草案由来自欧盟法律委员会的意大利籍委员阿尔蒂诺·斯皮内利主持修订。它富于智慧，饱含良苦用心，是一份谦虚谨慎、



不乏克制的草案。当然，它同样也余留了可修订的空间。这份草案应该说为域内成员国政府间的讨论提供了基础工作平台。撒切尔夫夫人于 1984 公开表达了对欧盟立法问题的反对，面对她的固执态度，欧洲议会最终选择了妥协，转而寻求制定一份作用力相对而言更为受限的文件——《单一欧洲法令》。这一文件应该说不乏其可贵之处，因为它确立了于 1992 年建立欧洲单一市场的目标，但它摒弃了欧洲域内各国希望建立统一政治联盟的意愿。面对这一失败，法国选择了听之任之，然而却有不少国家仍意图扭转局面，促成欧盟的成立。这其中包括欧共体的六个创始国和爱尔兰，要知道当时的欧共体一共才拥有十个成员国！不过，尽管这些国家走到了一起，但这个临时组合却又是非常脆弱的，面对来自英国的压力，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即便如此，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境下依然可以有所作为，毕竟所谓的挑战更多的是基于历史问题，而非欧盟问题本身。此次失败之后，尽管后续又召开过两次政府间会议，但各国均未再能让该计划更进一步。历史学家亦称，欧洲错失了形成统一联盟的最佳时机。

另一事件相对而言更为复杂一些，那就是两德统一。这一议题曾点燃了诸多著名政治派别的火焰，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心理，并险些一发不可收拾。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承载着太多民众情结的政治事件，任何简单化的解读和判断都是不可取的，都应为我们所警惕。对于两德统一这一议题，我们也从未能真正采取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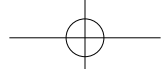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过一项具有深广反响的措施，并将之纳入到欧盟大框架内进行对待。当时的欧洲应该致力于将两德统一与欧盟建立这两大议题平行处置，甚至加速其进程，那时我们尚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了结此事。彼时的欧洲，只有法国可以对此提出倡议，因为撒切尔夫人的英国，甚至对两德统一亦持反对态度，故已完全置身事外。综上，当时的困境是显著的，这些困难均在于贝尔·韦德里那的书^①中得到了系统分析。密特朗总统在两德统一问题上做出的消极反应削弱了法国的主动性，事实上，那时的欧洲已经打开了一个实现域内联盟的绝佳窗口，一如 1950 年 9 月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时一样。只不过此时，我们再也见不到有法国的领导人站出来推动历史前进，每个人私下里都有着自己的盘算，他们都希望让德国人自己承担完成统一的一切开支。

进入 90 年代，尽管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罗斯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法国在欧盟创设问题上所能发挥的战略性作用依旧在进一步削弱。

在之后的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中，卢森堡和荷兰提出的两份颇具抱负的提案，相继又遭到了否决，最终，标志着本次会议最终成果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仅就欧盟货币问题——欧元的引入达成了共识。这份条约裹覆了经济的外衣，却在政治这个核心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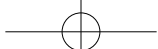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世界》，法亚出版社，1996 年出版。



题上继续中空。

随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有意填补这份缺失的空白。然而它亦未能在此问题上取得长足进步，其成果仅限于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诸如欧洲议会的职权和共同防务政策协同等。这些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其作用范围也是有限的。本轮谈判的过程异常艰辛，尽管如此，政治活动家们依旧尝试最后一搏。他们商定，于1997年5月23日在荷兰诺德维克先期召开欧洲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会议将专门就悬而未决的政治议题进行集中讨论，为一个月后召开的欧洲理事会阿姆斯特丹会议进行先期准备。经过本轮会谈，仍有三个问题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即委员会的构成、理事会选举权的均势，以及应由多数表决有效的事项清单，以期相关事项的讨论今后不再轻易因一票否决而搁置。某国一位曾参加了那次会议的部长对我说，面对那些可能导致会议再次陷入泥潭的不利因素，与会的一些人依旧希望能够突破，另一些人则趋于放弃。所有人都希望法国此时能够挺身而出，提出一份妥协性建议，使事态取得进展。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法国的表现，让大家吃惊的是，法国代表团在整个会议期间始终选择了缄默。

另一件事也会令你难以置信：法国在欧元即将生效之时所表现出来的孱弱。欧元计划早已有之，1978年时就提出了欧元的构想。1987—1988年间，该计划又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预期在1991年使欧元得以全面流通。应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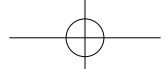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该说，在欧元计划推进过程中，法国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在欧元即将生效的时刻，法国越陷入了踌躇，以至于其生效之日最终延期。1996 年夏天，一份题为《再抛掉烫手的山芋》的文章见诸报端。文中，法国领导人一改伏尔泰式优雅的笔触，表态如果欧元计划陷入失败，法德两国将一致认为责任该由他国承担。他们相信，欧元计划存在流产的可能。

不管怎么说，欧元计划还是落地了，法国于其中也做了必要的工作，其结果还是值得庆贺的。然而回顾过往也不难发现，这份起初由法国极力主张并向前推进的计划，如同一株被不断去叶的蓟菜，慢慢地褪去法国化，渐渐失去了与法国的关联。

我们没有必要就计划的起源过多置评，事实清楚，毋庸置疑。当年如果没有法德两国的齐心发力，欧元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期间，德国的赫尔莫特·施密特和科尔两位总理都对此给予了决定性的政治支持。不过我们要说，真正以统一货币“埃居”取代旧式“蛇形浮动体系”的创想，以及建立统一欧洲货币基金和欧洲央行的计划，均诞生于巴黎，并在 1978 年 6 月 23 日的那次爱丽舍宫工作晚宴上正式升级定型。出席那次四人晚宴的人员，除了施密特总理和我之外，还有时任法国银行总裁的贝尔纳·克拉皮耶先生，以及霍斯特·舒尔曼先生，他当时担任施密特总理的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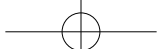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欧洲建设过程已经深刻地烙上了法国



印记。这并不是出于一种民族虚荣心，而是法兰西文化，或者说是法兰克—拉丁的文化血统使然，其中中和了那份既生机勃勃，又独断专行的日耳曼货币优越感。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情结，我着手采取措施，或者说是经过了一系列运筹，最终使得该货币被命名为“埃居”，它延续了法兰克—拉丁的文化底蕴。至于说这其中的技巧，如果我可以斗胆这么说的话，在于首先使用了一个英文称谓——**European Currency Unit**（欧洲货币单位），而这三个词的首字母正好组成了埃居（**ECU**）这个词。埃居这一称谓得到了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正式批准，并在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09条L款——第四段中得以明确表述：“在第三阶段开始之日，理事会应确定各成员国货币不可改变的汇率，以及由埃居取代这些货币的不可逆转的固定汇率，由此埃居本身将成为货币。”紧接着又有“理事会采取迅速将埃居作为单一货币引入那些成员国所需的其他措施”。上述就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关埃居的明文规定，经全民公决通过后，法国正式在条约上签字！任何人都无权对其进行变更！

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考虑，我坚持认为首任欧洲央行行长也应该由法国人担任。显然，这一提名不可能花落德国，为了防止埃居过于向德国马克同化，提名第二大创始国的候选人就再自然不过。就法国而言，它当时也拥有一批享誉世界的高水平货币专家，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比方说我们的三位前国库负责人都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一职。我想从上述这些人选中，或者说从我们已有的前财政部负责人中，不难找出一位合适人选，他的能力应该足以履行新欧洲央行的创建，以及维持行内各成员国间货币政策平衡的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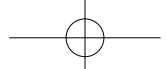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当密特朗总统即将在欧理会爱丁堡会议上进行例行协商时，我向他提及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一议题涉及法国国家利益，足够引起领导人的重视。

在此之前，科尔总理再次表达了将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的意愿，他希望借此向德国民众展现出其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在我看来，这一决定对德国来说未免过于有利。如若要求法国接受，德国方面必须正式向法国承诺，同意由法方代表就任首任行长。

密特朗对我的这一观点也高度重视。“你说得对，”他回答道，“我将捍卫这一立场。”

最终，欧洲央行落户法兰克福，而法国却始终没有得到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明确首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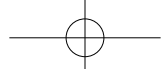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1996 年时，媒体透露各国央行领导人已经自行宣布了未来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人选。这一举动是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 109A 条款完全违背的。该条款规定“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应在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层面取得广泛一致的条件下进行任命”，其任命权取决于各国政府。当此之时，我立即向希拉克总统进行了告警，后者同样对我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相比密特朗而言，



他并没有什么更多建树，我亦未能感觉到希拉克本人将这场战斗前台化的意愿。欧理会随后表态，对这位由各国央行行长表决通过的荷兰候选人表示支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这位候选人是可以胜任的。然而正如我们随后所看到的，他面对这一全新的岗位时缺乏必要的政治权威，这一短板也使得他在将欧元全面引入世界舞台时显得力不从心。法国没能如愿取得这个首任行长的职位，欧洲央行也终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阿兰·格林斯潘！

与此同时，德国前财政部长缇欧·魏格尔发动了旨在为埃居改名的运动，他希望将这一名称改成更易为德国人的耳朵所接受的“欧元”，而不考虑这一名称听起来有多么难听。这一点我们本无从担心，“埃居”的命名有着坚实的法律根基，已经写入了《马约》条文，任何改名的决定都注定是行不通的。无论面对怎样的运动，我们只需抱定坚定的态度即可，一如德国人坚持将央行总部落户法兰克福一样。然而 1995 年 12 月 16 日，在欧理会马德里会议期间所发布的一份行文模糊不清、合法性备受质疑的文件中，欧理会决定“自第三阶段开始，欧洲统一货币的名称将是欧元”。

此外，在 1994 年年底欧盟委员会换届之时，爱德华·巴拉迪尔所领导的政府成功将欧委会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揽入了法国候选人、前外交部官员伊夫-蒂博·德西尔吉名下。这一职务此前由雷蒙·巴尔担任过，当时他的身份是该委员会副主席。而在 1994 年，该职位的重要性已显得更为突出，当时正处于欧元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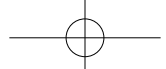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正式进入流通前的准备期。在这一阶段，既需要监督各类货币统一标准的实施，还要着手拟定未来进入欧元区的新成员国名单。要知道当时已明确表态申请加入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离《马约》中所规定的准入标准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过后来上述工作的完成情况是令人满意的，无论在复杂的技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欧元的推广均未遇到任何挫折。

不过，该任务最终却没能得以完成。民众对欧元还不甚熟悉，他们期望有一天能真正用上欧元的纸币和硬币。直到 2002 年 1 月 1 日，欧元的推广从此前的“多币并行”阶段正式进入到了“单一货币”阶段。毋庸置疑的是，法国应关注欧元推广的全过程，直至它最终成功流通，这会令法国当仁不让地继续保持该委员会主席一职。在我与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先生的一次会谈中，他对此亦确信不疑。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法国并未让德西尔吉继续连任，该职务随后便授予了另一名西班牙候选人。

综上，当欧洲统一货币计划在 2002 年行近完成之时，法国作为该计划的发起国，既没能将欧洲央行总部落户法国，也未能取得央行行长一职的任命（一度有意见认为，可以将首任任期分成两个阶段，从而取得折衷的平衡，然而该主张也终未能实施），更未能在经济与金融委员会项下取得任何斩获。而在此期间，彰显着瓦卢瓦人和文艺复兴时期辉煌文化底蕴的埃居也被粗暴地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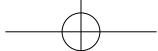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成了欧元。

欧洲事务近期的相关变化更凸显了法国行动力的丧失。直观上来看，法国似乎已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使其对自己从前的一些设想不再坚持，转而交由它国继续实施。

德国外长约施卡·菲舍尔的立场延续了这一结论。经历了漫长的人生长河后，菲舍尔本人也从起初的极端革命左派变成了“新中间派”，其关于欧盟未来的相关构想亦经历了类似的变化。2000 年春天，他在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发表了演讲。在这篇讲稿中，菲舍尔一改过去由专业代笔人执稿的笔调，亲自回顾了其 18 个月来政府行政工作的经验得失，并全力阐述了他新任欧理会主席后的行动纲领。

菲舍尔结论性地指出，尽管欧盟扩张是大势所趋，但目前对 15 个新成员国的吸纳工作却要比预想的困难得多。以欧盟目前已有的规模，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应再继续扩幅。欧盟应该转而谋求在大欧洲的框架之内，深化部分国家的联盟程度，建立联邦体制。菲舍尔同时描述了他心目中的联邦结构：联邦议会由上下两院构成，一院代表民众，另一院负责阐释各成员国主张；联邦设专职主席一名，并设立最高宪法法院。他最后指出，只有德法两国紧密合作，这份联邦计划方能得以实现。

如果仔细斟酌一下这份讲稿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只是重申了罗伯特·舒曼 1950 年所提出的相关主张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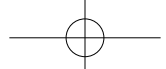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这一构想可以说打破了欧洲域内那份伪善的禁忌，即决不能使用孟德斯鸠所推崇的“联邦欧洲”这一说法。受这种顾虑影响，大部分欧洲领导人，包括法国领导人在内，都极力在遣词造句上字斟句酌；然而事实上，欧洲在域内竞争机制、国际贸易方式以及统一货币体制三大核心方面已然进行了联邦制实践。

此外，这一构想也消除了此前横亘在欧洲一体化问题面前的巨大障碍：英国及其北欧盟友在一体化问题上拖延不前，新一届德国政府内部似乎亦有打算效仿，以期为法德合作重新设立阻碍。

菲舍尔的上述提议得到了施罗德政府的公开支持。此方案一经提出，随即要求法国方面对此进行坦诚、积极的回应。应该说，这是自 1984 年以来，法德两国就欧盟一体化问题再次携手共事的绝佳良机，法国理应接过这枚橄榄枝，至少说，这一提议值得两国为之深化探讨。如果两国之间不能就这一性质非凡且历史意义深远的议题展开磋商，那么领导人之间每一次空泛的见面仪式又有什么意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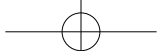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然而，法国却选择了不予置评。它缩头躲在了自己的窃窃私语（拉封丹这回该知道鱼和兔子的区别了）和泛泛而谈里，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法国对于欧盟主席一职的履职能力，以至于该职位落得在葡萄牙和瑞典之间轮转。要知道，欧盟主席自身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他须将已启动两年之久的欧盟法律改革继续推进——这一工作与菲舍尔提出的欧盟远期愿景本身并不冲突。



那么到底法国该采取怎样的姿态呢？我们其实应该更积极主动一些，应召集欧盟各创始国召开“一体化进程五十周年大会”，共同对过去五十年来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以期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内容进行定义。同时，也要将德国新近提出的设想纳入考虑范畴。我想这一措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 1950 年时，正是这六大创始国首先对罗伯特·舒曼的倡议做出了积极回应，后来创建欧盟的构想才被世人所共知。要知道，在这六大创始国中，既有德国这样的大国，也有卢森堡这样的小国，能让这样体量不等的国家结盟，而不致使外界解读为“大国”意志对“小国”的强加，这是多么的不易！

欧盟是建立在战后的瓦砾和仇恨之上的。五十年来，它历尽艰辛，见证了苏联帝国的倒塌，毅然走到今天。这段心路历程和开拓创新的历史值得我们为之进行细致分析，并积极探寻未来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比这更合情合法的了。如果说通过这个总结会，我们能够以新约的形式制订新的行动计划的话，那么只要各国同意签署该条约，后者都会向它们开放怀抱。

法国应该重新担负起这样的构想。在欧洲这片广袤的经济沃土上建立联邦的主张，亦应向公众展示出我们希望为之努力的方向，以便博取民众的理解。我想说，这些是我个人一直坚持的主张，我的想法还一直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从 50 年代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始，直到世纪之末的欧洲统一货币体系，来自法国的原动力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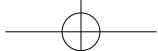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一直未间断地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公众并不会对货币问题的细节投入更多关注，因此，他们面对法国政治衰落问题所表现出的茫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状态却不会对货币问题本身带来任何影响。如果我们翻阅欧洲重要职位的年鉴，并一年一年地进行浏览，我们就会细致梳理出这条清晰的脉络，即法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将从前的那些重要岗位拱手相让的。历史上，凭借候选人的天赋才智，法国人曾两度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并相继领导了欧洲最高法院和欧洲投资银行的工作。现在这些职位早已不再由法国人担任。诚然，现在的欧洲是一个扩大化的欧洲，各类岗位应由来自各成员国的代表共同担任，然而，西班牙籍代表相继担任了北约秘书长和欧盟经济金融事务委员会主席，并获得了欧盟外交防务政策高级代表的提名，英国的代表继西班牙之后继任了北约秘书长一职，并取得了新委员会项下外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当然，对于这些人选的远见和业务能力，我们无法苟同。

令人惊奇的是，法国人自己似乎也已忘却了那些曾经在欧洲范围内担任要职的同胞的存在，也许只有上帝还记得，法国的那些高级行政及外交人员当年曾因其卓越的素质而长久地蜚声海内外！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法国的政治资源已经被自身内政问题所全部吞噬，以至于无力在欧盟框架内继续积极勾画自身的行动，确保其存在感和影响力。显然，法国国内的左右派并存局面，使



得国家不得不将其主要精力投放到内部平衡问题上来，最后只能导致这一对外颓势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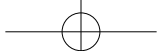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面对这一局面，我们却从不对其“衰落”的原因进行分析，只是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后果——在那些曾经历过辉煌过往的人心中，充斥着无尽的感伤。

我想该结果与国内自身关于“清台”问题的长久论战并无关联，因为后者并不涉及这一议题。它更多地应归咎于法国政治制度自身的缺陷，而国家对外层面的衰落正是由这一缺陷引发的间接结果。

至于我们在面对世界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虽然只是我们在国际行动中的第三要务，它不应继续拘泥于“角色”这一执念。不管怎样，世界的变化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一灵活性应更多地表达出我们希望参与世界进程的意愿，要让人们与当今的世界“共生存”，而不要总是试图去领导它。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自身需捍卫的利益——这是当然的事，但同样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我们亦有需要和其他演员——其他国家的人民共同完成任务。他们会审视我们，也会试图了解我们的反应。我们完全可以向他们展示出一副审慎、宽容，对他国的选择持积极开放态度的国家形象。

也有一些变革会转而朝向国家内部，且不会对我们的国内生活带来过多影响。在这一层面，我要特别提到我们同南美国家间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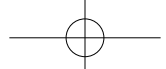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的合作形式。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南美国家从未将其内部纷争问题投向外部世界。我们彼此之间存在利益交联，彼此相互理解，我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又是彼此相近的。

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有三个国家和地区将在政治制度、商业及金融领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它们是中国、非洲大陆和俄罗斯联邦。当然，日本和印度也同样是不可小觑的力量。

中国觉醒了

最大的变化来自中国。我们见证了中国在技术及国力层面以近乎每十年翻一番的速率急速增长。为了佐证这一说法，只需看看中国是如何举全国之力加入世贸组织的例子即可。中国逐步走向成熟，在我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大多说中国人看来，这是一次试验、一次“考验”。它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蕴含着各种风险。不过中国社会广大的农民阶层却不抱这种想法，他们暗地里正为米价是否会受影响而忧心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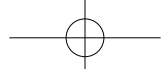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经不起失败，或者说中国不会允许其经济增速出现大幅的滑坡。如果出现不期局面，那么目前业已存在的失业问题马上就会变为爆炸性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个特殊难题，那就是政治改革，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史无前例，迄



今为止亦未有人对它施以良方。此外，在中国不断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可以说是缺失的。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与其说需要良师益友对之进行谆谆教导，倒不如说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与之进行对话的伙伴来与之分享既有的成果和经验。我们更要看到，今天的中国已彻底摆脱了一个规律的影响：以往的中国社会，几乎每隔三个世纪就要发生一次巨大的震动，这些震动源自于人们因社会不公正所产生的巨大不满，这些不满的源头基本上又归因于饥荒、间或性的洪水，还有类似于今天的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的情况。法国可以成为中国专属的对话者，我们会专注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以审慎的态度与之分享我们的经验。要看到，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那段充满争议的历史——西方强加于中国及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贡赋——已渐渐成为过去。法国可以向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当今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表明，我们愿意伴随它一起发展、一起成长。这条对话的道路，其实是敞开了的。

——❁ 我们可以向非洲示爱！ ❁——

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仍将继续它漫长而艰难的转型。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忠于他们传统的生活模式，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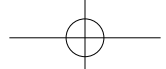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同时又向往城市化进程，尽管后者很难为他们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和收入；他们也面临着被高致命性病毒感染的危险，还要不时遭受着极端原始暴行的折磨。如上种种现状使得这一转型常常异常艰难。同时，考虑到该区域自身教育水平及人口更新的因素，这一转型也注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对于历经殖民时代的法国人来说，我们的脑海中总夹杂着过往的那些或好或坏的习惯和回忆，这让我们始终无法对非洲抱有一种持续性的态度。我们会不自觉地希望非洲复制法国的社会模式，却忽略了后者自身的特性。我们身上那些惯于冲动的特质也常让我们以人道之名对其进行相关介入，但这些行动常常是不合时宜的，随后便会迅速终止。

法国长期以来对非洲法语国家施行的是一种审慎的政策。该政策形成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戴高乐将军及其继任者们继承并延续了这一政策，并最终实现了科摩罗和吉布提的独立。这一政策使得法国在非洲的去殖民化行动相较其他国家而言更为成功，这使得每一个国家的独立均得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未留下任何遗憾和积怨。

但在 80 年代，法国放弃了这一既有政策，转而谋求在非洲大陆实现整体趋同，并试图将其作用范围触及那些原葡语国家，甚至是东非国家，这其实是在冒险，最终的结果也是令人沮丧的。它部分程度上破坏了那些法语国家既有的稳定，也未能加速其政治民主化进程。法国试图向大量的非洲国家施以援手，结果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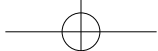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降低了我们的双边援助效率。

法国同全欧洲一样，不能对非洲大陆的变化不管不问，何况过去起始于中亚山地国家和俄罗斯大草原的西向移民潮，近年来由于经济条件的差异和交通方式的改善，已经开始趋向为由南向北的人口迁徙。未来几十年内，法国的对非双边政策只能在非洲法语国家中发挥其效能，因为它们实践着派生于法国的法律原则，拥有着师从于法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这为我们的双边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法国的政策正是对这种文化姻亲关系的回应。我们所具备的资源水平能够让我们在教育、技术转移、就业及艾滋病防治等诸领域展开各项意义深远的合作行动。

至于其余的非洲国家，无论是面对我们的欧盟伙伴国，还是在联合国体系之内，法国都没有一丝一毫让自己鹤立鸡群的想法。对于由非洲各国自行主导的发展行为，法国应在上述框架内积极为它们谋取有效且经得起检验的援助措施，以期见证各国的经济增长得到实质性改善。同时，它还应呼吁国际社会在更大限度内帮助非洲人民消除种种不幸、饥荒和病疫。法国真正该担负起的是催化剂的角色，而不是领导者的身份。

当我们思考非洲的时候，请放下我们的优越感，收起我们无力的怜悯！我们应拿出勇气，跳出那些专家报告中所形成的灾难结论。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即便是未来几十年内，非洲大陆也不会复制出美国模式。我们应该向非洲示爱！这是一块灾难深重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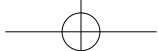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的母亲大陆，在她广阔的幅员之上，我们甚至可以审视人类出现之前地球的模样。非洲大陆从比我们更为久远的远方而来，它有权让我们留给它充分的时间，以它自己的方式发展演进；它也有权在国际互助的体系内享受它应享有的那一份关爱，尽管事实上它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不过，一切我们所能给予它的帮助，均应直接施与它的人民，绝不应被他们贪得无厌的领导人从中截留，更不应受制于中间环节的低效性而导致它迟迟无法发挥作用。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高层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赋予其必要的权限，从而落实对上述援助使用情况的监管，一如罗马帝国时期的监察官和古代中国的钦差一样。

俄罗斯与大欧洲

说到俄罗斯，戴高乐将军曾对欧洲版图做出过如下定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今天的欧洲领导人，每当他们就欧盟扩大化问题各自进行热情洋溢的阐释时，似乎都无一例外地忘记了俄罗斯。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甚至明天的马其顿一并纳入欧盟版图，或许也准备好了迎接乌克兰的入盟，然而关于俄罗斯，他们却只字未提！

俄罗斯加入欧盟显然面临着两大障碍：对欧洲而言，它未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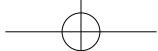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太大了，它的人口也太多了。将它纳入欧洲的制度体系很可能会打破联盟内部本就十分脆弱的平衡关系。此外，俄罗斯领土很大一部分身处亚洲，与中国有边界关系。试想，如果日后的欧盟要与中国为邻的话，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正是出于这样的审慎考虑，我们决定还是忘掉俄罗斯。

然而俄罗斯不会过久地淡出人们的视线！其邻国均为它未来的走向忧心不已。此前关于波兰，欧盟负责扩大化问题的代表就已发表过如下声明：“我们不会让波兰成为欧盟的东部边界！”在他此番表态的背后，是白俄罗斯紧紧归附于俄罗斯的事实，它们构成了庞大的俄罗斯势力。

在有关俄罗斯的种种思虑之中，法国应该秉持一种公正的态度。尽管这个国家尚有各种不足之处，但它毕竟未经流血冲突就完成了从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的重大过渡。况且，俄罗斯在外交、工程及科学领域英才辈出，其能源与工业原材料储量也雄踞世界之首。

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命运走向尚不明确。就其国土来说，其西部领土明显趋近于欧洲。至于它西出乌拉尔山、东至太平洋的广袤东部领土，俄国人的新民族主义者并未准备对它失去管控。有感于从前军事大国的地位的丧失，他们似乎正变得尖刻不已。

当鲍里斯·叶利钦第一次正式到访法国时，他在大特里亚依宫对我进行了礼宾接待。叶利钦很感激我当年没有像其他领导人那样羞辱他——在 1991 年的欧理会斯特拉斯堡会议期间，与会的



3 法国——国际一员，还是世界中心？

Le positionnement dans l'espace ou la France centre du mo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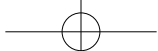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欧洲各国领导人均拒绝接见叶利钦，法国领导人随后亦拒绝了双方在爱丽舍宫会见的请求，只有我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家饭店宴请了他。这次在大特里亚依宫，叶利钦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完全没有想过的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加入欧盟，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能给我一些建议么？我会把我的一名助手引荐给您（阿纳托利·丘拜斯），您来指导他我们下一步的做法。”

在此之后，欧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张。在这次被吸纳进联盟的国家中，一些国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其欧化程度相较俄罗斯而言都更为低下。然而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并出于同样的谨慎考虑，我们再一次选择性地忘却了俄罗斯。

如果法国要对欧洲未来前途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对俄罗斯的日后地位进行考虑。在欧洲制度层面，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做出一些决策，比如涉及“大欧洲”的相关法律，以及有关“欧洲联邦”的相应法规，如果后者有朝一日真的得以实现的话^①。未来，美国会对俄罗斯施加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尽管人们已经呼吁俄罗斯摆脱来自美国方面的过度管控，而德国在经济方面对于俄国的影响力依然优势明显。相对他们而言，法国的作用在于延

^① 关于这一话题，我本人对欧联邦日后的对外关系有一点个人建议。未来，有关承认域外国家合法地位以及中断外交关系的决定，可以列入联邦管控范畴，也就是说，上述决议将以投票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而不再允许一票否决，且表决结果各成员国必须接受并执行。我想大家都清楚，除此法之外，任何其他的方式都无法对之进行有效的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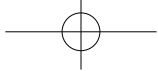


续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身份地位的思考和探讨：俄罗斯的国家进程相对其欧洲伙伴而言更为独立自主，我们双方的对话一直处于良好的水平。尽管两国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公信力滑坡的问题，但两国之间，即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却存在着强烈的历史和文化关联。

所有这些值得思考的因素，出于时间考虑，我不在这里一一陈述了。不过法国或许从现在开始便可以呼吁：在那个被我们的现任领导人们所推崇的假定中，即那个未来由三十个成员国所组成的“大欧洲”中，“俄罗斯联邦”必须参与其中。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尚无法做更多的展开，因为太多因素目前来看仍不确定。不过我们应该在版图之上对其予以明确，因为透过这扇已然敞开的大门，我们可以瞥见未来的景致：那个未来的“大欧洲”，既包括西部的欧联邦国家，又包括中北部的非联邦欧盟成员国，还包括东部的俄罗斯联邦。而北美大陆的组成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联邦及墨西哥联邦，与之相比亦大同小异。

如上的种种探讨，终又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初始的观点上来：对于法国来说，核心要务在于破除心中那份自负又幼稚的执念，摒弃从前僵化的“角色定位”的想法。要成功地让我们的伙伴觉得，在面对未来留给我们的种种疑问时，法国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经验与特质，为相关问题寻求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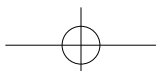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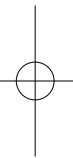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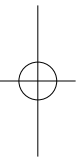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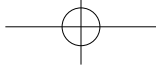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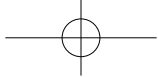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君主制柯尔贝尔主义^① 与雅各宾中央集权

Le colbertisme
monarchique et le centralisme jacobin



①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年8月29日—1683年9月6日)是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他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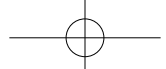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法国是天底下最美的王国，连太阳都为之眷顾。

——安托尼·德·蒙克莱田

“法国是一个农业国，有保护主义的传统。”这是国际社会对法国所采取的统一认识。此外他们还认为：“基于这两个特性，法国很难适应当今世界关于全球化和开放市场的相关要求。由于法国社会对时代变革潮流表现出了一贯的抗阻，它从而也遭受了经济与政治的滑坡。”

这是大多数国际学者对于法国政治衰落问题所给出的另一种解释。这一观点有别于伯克的说法，他认为法国衰落的症结在于继续坚持过时的保护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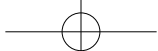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这里，我想更换一种口吻，以交谈的形式进行阐述。毕竟，现在要探讨的是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评价——对我们自身存在方式的评价。那么，这些评价正确吗？其结果真的一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吗？我们是否应该，我们又是否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呢？

“法国是一个农业国，有保护主义的传统。”

当英国著名的经济刊物如是评价我们时，我觉得他们的意见是中肯的。这一观点与其说是一种批评，倒不如说是一种客观描述，符合我们过去的真实状况。

是的，法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从南方地区的罗马文明时代开始，到第二个千年里对中北部地区的垦荒，法国一直延续着这样的状态。今天，我们只需沿着那些二级公路走一走，便会更深信这一点。法国各地遍布着村庄，这些村庄以各自的教堂为中心群居分布，村民一直从事着或好或坏的农事工作。与英国和德国的大土地产权制相比，法国的土地权划分更为细致合理。既有的农事经验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最近五十年来，法国的农业生产技术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农产品产量成倍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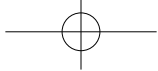
当法国正式开始实行全民普选之后，农业从业者的优越性便赋予了他们巨大的政治话语权。后者旨在保证、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他们通过行业组织对市场实行垄断，亦通过不断施压，促使农产品价格逐年攀升。农民自行决定国家农产品期货的产量，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谷物办公室”，并在 1956 年颁布施行了



“牛奶价格指数”。同时，这种农业话语权也力求规避现有法律对农业生产的诸多限制。比方说，它曾成功地在国家社保体系之外，单独为农民群体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社保系统，它也曾说服相关部门为农机设备驾驶员发放驾照，且这一政策直到 1999 年才寿终正寝，如上这些农业特权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了第四共和国末期。此外，农业团体在 1957 年还要求国家实行普遍的农业政策，其间为了平衡《罗马条约》中相关条款所引发的自由贸易趋势，他们又明确地提出了同意签约的前提条件。我们真的很难想象，1958 年之前的国民议会农业委员会主席到底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描述的那样，法国的农业文化及其生活模式中并没有交换的传统根基。曾经的法国农业，其生产目的仅限于维持一时一地的消费需求，有时甚至只为了保证基本生存条件。要知道，直到 18 世纪末期，法国依然遭受着饥荒短粮的威胁！后来，农业生产的目的逐渐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因为法国需要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余粮”——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词汇——才可以出售给他国。

在这样的框架内，自然不会给农产品交换余留太大空间，更不用说农业市场。相比于英国、佛拉芒以及德国汉萨同盟内民众的商业化风气，历史上的法国农民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者。他们因循四季的更替，在自家土地上辛勤劳作。尽管不时也会遭



受灾害影响，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动机，依旧仅是为了满足家庭及本地居民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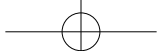
正是基于这种深层次的农业情结，在 1981 年的总统大选时，密特朗总统所代表的左翼阵营借助工业及城市化社会的诸多问题，向民众宣扬了其马克思主义式的相关主张，而密特朗本人的一张宣传海报，也被张贴在了郊外的一个村子里。村子的中心，正是该村的教堂。

我的一位来自奥弗涅的议员朋友也是农业人士，他曾就该问题对我总结道：“农民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状态。”

将法国视为财产

法国保护主义的源头也非常久远。它并不是一个经济型社会为解决现实外贸问题而做出的反馈。更多地，它反映了法国历史上一种古老的国家治理理念，即将法国整体上视为一种国家财产。同时，由大革命及帝国时期传承下来的中央集权观念，又客观上强化了这种国家治理模式。

我们常常批评法国至今还保有柯尔贝尔主义倾向，其实这所谓的柯尔贝尔主义远不属于“主义”的范畴。柯尔贝尔本人工作勤奋，每天 16 个小时的超强度工作，起草了大量的文章著述，颁



布了为数众多的法度法令，并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但是他从未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对他的行动目的进行揭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难从中一探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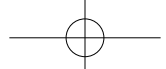
柯尔贝尔首先是法王的臣仆。他的事业起步于马扎然红衣主教一职，其职责在于做好王室的管家，确保王国繁荣昌盛，提高财富生产力。他所管理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由各类企业、银行、法院和行政机构组成的复杂系统，相反，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王国的全体子民及其全部的所有物。他要为这一整体的繁荣而负责。

在 G.J. 吉努的著名作品《柯尔贝尔先生》^①（我们将他称为“柯尔贝尔先生”，正如我们也称呼“比内先生”或“巴尔先生”一样，是一种对于财政官员的习惯称谓。在法国，我们绝不可能这样去称呼一名外交部长或者国防部长！）中，作者向我们阐释了这位时任王国总管意图：

应不惜一切代价杜绝资源外流，换句话说，不让王国的财富流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切王国的必需品都应在境内生产，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对外采购。

“柯尔贝尔主义”展示的是一种进攻性姿态，而并不是像传统贸易保护主义那样的防御性姿态，尽管一些有失确切的历史解读常常将二者混淆起来。柯尔贝尔鼓励发展那些可在国内自行生

^① 《柯尔贝尔先生》，格拉赛特出版社 1941 年出版。



产业的产业，而对过时的、已被外部竞争所威胁的产业则不再继续支持。这是区别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地方，因为继续旧生产、旧产品正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每隔一段时间，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都会将阶段性成果统计成表格进行展示。其中，1669年的《状况报告》尤为令人惊异，表格中列举了该年度王国内为数众多的新增产业和国家鼓励产业的名录，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新式手工业、纺织作坊、铸造作坊和新开矿场。在这篇统计中，柯尔贝尔本人还对外国的产品进行了讽喻，比如说英格兰的长筒袜、荷兰的布、购自里加或普鲁士地区的麻，还有产于瑞典或比斯开地区的冶金产品。不过，他此举的用意并不是为了指出上述产品对于国内相关产业的威胁，而是意在宣告，这些相关产业同样将在法国境内生根。最后，他另起了一段文字对这份长清单得意地进行了总结，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充满进攻意味的动机：“伟大、慷慨！”

如果说法国真的存在贸易保护主义，那它也绝不应和柯尔贝尔联系到一起！

毫无疑问，法国保护主义的渊源在于其农业国家的属性。农民一生从事着单一的职业，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断劳动。法国农民常年定居在自己的耕地旁，除了服兵役之外，一生极少有机会能离开土地哪怕十五公里的距离。这与美国农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可以自在地穿越整个国家。因此我们所说的法国保护主义与其